皮娅•S•朔伯尔（Pia S. Schober）、C•卡塔琳娜•施比斯（C. Katharina Spieß）、
尤里安娜•F•施塔尔（Juliane F. Stahl）

需要优质托幼，我们有理由！

哪些人在使用哪种质量的托幼机构？
这对于职业和家庭的平衡意味着什么？

美好社会：
社会民主主义
#2017plus

FRIEDRICH
EBERT
STIFTUNG

美好社会：社会民主主义
2017 plus

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
2015-2017年的一个项目

什么是“美好社会”，它具有哪些特征？在我们看来，“美好社会”应当包括社会公正、生态可持续、富于创新且运行有效的经济以及公民积极参与的民主制度。自由、公正和团结，则是支撑这一社会的核心价值。

我们需要新的思路和方案，以使“美好社会”的理想不至于沦为乌托邦。为此，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正致力于为未来数年的政策提出具体的行动建议，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课题领域：

– 对自由、公正和团结等基本价值的讨论；
– 民主制度与民主参与；
– 新的增长模式，以及积极的经济和财政政策；
– 体面劳动与社会进步。

“美好社会”不会自发形成，它只有在我们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才能不断地得以塑造和完善。在这一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利用其全球网络，力图综合采纳并整合德国、欧洲和国际的视野。在2015至2017年期间，基金会将相继推出一系列出版物，并陆续举办各种研讨和交流活动，不间断地致力于“美好社会”这一主题，为它描绘出通往未来的发展途径。

关于该项目的更多信息，可通过以下链接获取：
www.fes-2017plus.de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

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简称FES）成立于1925年，是德国历史最悠久的政治基金会，它以德国首位民选总统的名字命名，始终秉承并坚持社会民主的自由、公正和团结的基本价值观，并与社会民主和工会保持紧密联系。

艾伯特基金会致力于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特别是在以下方面：

– 通过政治教育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
– 提供政策咨询；
– 通过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处，形成网络开展国际合作；
– 资助青年才俊深造；
– 通过档案馆和图书馆等保存对社会民主的共同记忆。

本期作者简介：

皮娅·S·绍波教授、博士（Prof. Dr. Pia S. Schober）是图宾根艾伯哈特-卡尔大学微观社会学教授和德国经济研究所（DIW 柏林）研究员。她的重点研究领域是儿童早期的教育及家庭政策、家庭社会学、性别不平等及纵向量化数据分析。

C·卡塔琳娜·施比斯教授、博士（Prof. Dr. C. Katharina Spieß）是德国经济研究所（DIW 柏林）教育与家庭部部长，同时任柏林自由大学教育与家庭经济学教授、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她的工作重点是儿童早期教育、家庭与职业的平衡、教育不平等及调查研究。

尤里安娜·F·施塔尔（Juliane F. Stahl）文科硕士，德国经济研究所（DIW 柏林）教育与家庭部助理研究员，同时任国际马克斯普朗克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她研究的重点是儿童早期教育的机会不平等及其对家庭和职业平衡所产生的影响。

责任编辑

约纳坦·门格（Jonathan Menge），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政治与社会论坛，家庭与性别政策处处长。

皮娅•S•朔伯尔（Pia S. Schober）、C•卡塔琳娜•施比斯（C. Katharina Spieß）、
尤里安娜•F•施塔尔（Juliane F. Stahl）

需要优质托幼，我们有理由！

哪些人在使用哪种质量的托幼机构？这对于职业和家庭的平衡意味着什么？

前言

优质托幼人人均享，机会平等始于起步！

在过去几年中，尽管有关方面采取了大量改进措施，大举扩建了托幼规模，但对许多德国人来说，家庭与职业的兼顾依然未能真正实现。导致的后果之一是：妇女为了照顾家庭而缩短工作时间，工作时间的缩短则往往使她们长期陷于部分脱离职场的处境——而这又会产生许多负面效应（关键词：养老金性别差距 Gender Pension Gap）。当被问及有什么能帮助人们更好地协调职业和照顾子女之间的关系时，我们最常听到的答案之一是：继续扩建托幼设施。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的一项题为"年轻女性想要什么"[1] 的研究项目所得出的一个核心结论是：妇女们希望得到（时间上）更加灵活、费用更为低廉的托幼服务。托幼费用的区域差异很大，有些地区尚不能保证提供充足的托幼名额。此外，通过对"美好社会—社会民主主义 2017plus"[2] 项目框架下所做的一项具有代表性的民意调查"既要质也要量！——请谈谈您对国家托幼责任的看法"[3] 结果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其他一些有趣的发现：总体而言，民众认为在实现职业与家庭的平衡方面，国家应该承担很大责任。但分析也显示，受访者不仅认为托幼费用非常重要，而且认为托幼质量也非常重要。大多数民众认为政府应继续加大对托幼的投入。

在本研究报告中，我们将对托幼质量进行深入分析。因为人们有充足理由要求获得优质的托幼服务！其中的首要原因无疑是符合儿童利益和促进儿童成长。但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将跟踪另外两个迄今为止在托幼质量讨论中多被忽视的方面：1、家长的社会经济背景在子女获得优质托幼服务方面起到什么作用？2、托幼质量对家庭与职业的和谐兼顾意味着什么？

国际上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托幼质量对职业和家庭的平衡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尤其对母亲而言。此外还发现，能否获得优质托幼服务，也和家长的社会经济背景相关。尤其对有移民背景的儿童来说，大量事实表明他/她们往往得不到最好的日托照顾。可恰恰是这些儿童非常需要获得优质的托幼服务。但本研究报告也显示，尤其是针对托幼质量和家长职业特征之间、以及托幼质量和家长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深。

国外相关研究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即优质托幼可以提高父母的劳动生产率。因此，优质托幼也符合企业的利益，可促使企业自办托幼设施，为职工提供优质的托幼服务。

投资托幼便是投资未来。如果所有儿童都能获得优质的托幼服务，那么家长们便可以少一些兼顾家庭与职业方面的难处，妇女也能更多地实现她们的工作愿望，从而确保自身的经济独立（包括年老以后），同时，

1 维普曼（C. Wippermann，2016）："年轻女性想要什么"，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柏林总部，网址：http://library.fes.de/pdf-files/dialog/12633.pdf (2016.11.08.)

2 网址：https://www.fes.de/de/gute-gesellschaft-soziale-demokratie-2017plus/ (2016.11.08.)

3 霍布勒，罗伊斯，卡纳穆勒（D. Hobler, S. Reuyß, A. Knamüller，2016）："既要质也要量！——请谈谈您对国家托幼责任的看法"，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波恩总部，网址：http://library.fes.de/pdf-files/wiso/12871.pdf (2016.11.08.)

德国儿童也能在起跑线上获得平等的机会。因此，提出优质托幼的要求，我们有充分的理由！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托幼机构质量标准。其次，联邦政府应在提高托幼质量方面承担更多费用。

祝各位读者朋友开卷有益！

约纳坦·门格 （JONATHAN MENGE）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
政治与社会论坛
家庭与性别政策处

一

引论[4]

1.1 研究动机和研究内容

在过去几年中，随着三岁以下幼儿入托名额的增加和幼儿园适龄儿童全日制幼托服务的扩大，德国的托幼服务在数量上有了大规模的提高。直到最近，这些托幼设施的质量问题也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2014年11月，德国联邦政府、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发布了一份联合公报，明确提出要制订核心领域的质量目标。[5] 2015年11月，各方再次召开会议并作出决议，在提高托幼质量的进程中，应充分考虑难民儿童及其家庭的融入和促进问题，以应对德国面临的最新状况和挑战。[6] 2016年11月，联邦与州政府再次就此议题召开联席会议。

提高幼儿日托机构的服务质量，可以从不同角度找到很大的关注点。一方面，相关调查，如NUBBEK（关于儿童早期教育和照料的全国调查）（Tietze et al. 2013）研究表明，目前托幼机构的教育质量只能被评为一般水平。另一方面，无论从质量标准的规范还是从实际的托幼质量来看，都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参阅Bock-Famulla et al. 2015, Viernickel et al. 2015）。当我们考量高质量的托幼机构对儿童成长的意义时，不得不对上述发现作出批判性的评价：能对日间托幼机构中*所有*儿童起到促进作用的最佳前提条件并不存在，而且，这些前提条件的优劣也存在地区分布不均的现象（参阅Spieß 2010）。

这样，按照教育经济学理论，家庭外幼儿教育和照料本该取得的高回报就无法百分之百地实现。因为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均证明，高回报须以高质量为前提——仅仅提供一定范围的量是不够的（参阅Anders 2013，或其他教育学和心理学领域的元研究，如Burger 2010; Camilli et al. 2010; Anderson et al. 2003; Gilliam & Zigler 2000; Gorey 2001）。所以，关于如何提高德国托幼机构的质量，成为最近的热议话题——其中特别强调了优质托幼对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性。不过依然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在讨论中甚少论及，而在本文中，我们将对这两个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一方面，优质的托幼服务是否向所有儿童敞开了大门。换言之，所有的儿童，不管他/她来自哪个地区，也无论其社会经济背景如何，都可以享受优质的托幼服务。许多教育经济学和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进一步证明，特别是那些来自社会经济弱势家庭的儿童尤其能从托幼机构的高质量中受益（参阅 Ruhm & Waldfogel 2012; Waldfogel 2015）。本研究的第一部分将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探讨优质托幼服务的获得是否以社会经济背景为条件，以及是否因此使部分儿童更难从优质托幼中受益。家庭收入水平、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移民背景构成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最重要特征——在下文的概念讨论和实证发现中，我们将重点对这些特征进行考察。

另一方面，迄今为止的讨论还忽略了一点，即高质量的托幼不仅对儿童成长至关重要，而且也会对家长、对他/她们家庭和职业的兼顾产生直接影响。[7] 大量的经济学研究证明，母亲的就业会受到一家托幼机构提供服务

4 我们在此感谢克拉拉•霍尔特曼（Clara Höltermann）协助我们查阅文献及对本研究所做的其他工作。

5 一个由各参与方组成的工作小组将在2016年底提交一份相关报告。

6 在此次联邦和各州的联席会议上，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雇主和工会签署了一份对儿童早期教育进行投资的联合声明。

的量、即服务内容多寡的影响。最近的调查也表明，家长对托幼服务的满意度会随着托幼机构服务供应量的扩大而提高（参阅Schober & Schmitt 2013；Schober & Schmitt待出版；Schober & Stahl 2016）。尽管其他实证研究指出，家长对托幼机构的质量表示相当满意，但是在不同的质量特征之间依然存在差异，也就是说，家长并非对所有方面都感到同样满意。相应地，他/她们的就业、家庭与职业的平衡以及主观幸福感都会受到托幼质量的影响。在本研究的第二部分，我们将探讨这些方面的问题。

对于上述两方面的问题，尤其第二个问题，迄今为止只有极少数关于德国的实证研究。而在英美两国，很早之前便有相关文献对这两个复杂问题进行了探讨。本研究对这些文献进行了参考和归纳。如有关于德国的研究，我们也会加以利用。我们选择和关注的重点是那些定量实证研究，即依据微观数据和量化方法对相关关联进行分析的文章——纯理论性研究或定性研究不在本文考虑之列。针对上述第一方面和第二方面的问题，本文分别借鉴了20份和25份相关研究。

我们对各项研究的汇总，是在对不同数据库进行大量文献检索的基础上完成的。鉴于本研究的篇幅有限，上述文献的汇总和整理不能被视为一次涵盖全部现有研究成果的文献调查。它更多地是一个概括性的介绍，目的是揭示当我们从儿童成长以外的角度来考察托幼质量时，相关研究中有哪些潜力可以发掘。

7 下文中在谈到对家长的影响时，我们指的是广义上与工作和家庭、家务和培训兼顾相关的影响。本文并不关注托幼对家长面对孩子时的行为、家长的教育方式或其他变化的影响。

在本研究的两个主要部分（第四和第五章）之前是**概念**介绍部分。它是从理论和日常生活的角度，探讨家长的社会经济特征、托幼质量和家长幸福感及其就业之间的潜在影响机制。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下，我们的目光不再局限于质量和对儿童成长影响之间的简单关联。通过概念分析，我们旨在阐释社会经济背景、儿童特征、家长偏好及其所使用的托幼机构质量之间的关系。这其中既有直接关系，也有间接关系。以间接关系为例，托幼机构的优质服务会让家长更容易实现家庭和事业的和谐兼顾，从而增强家长的幸福感，而这又会进一步提高儿童的幸福感。分析框架的作用在于系统化地归纳和总结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

在第二章开始上述讨论之前，我们将先简单讨论一下德国在托幼质量规定方面的法律框架。此外，我们还会在第三章中探讨家长如何以及在何种前提条件下对托幼质量做出评价。在这方面，我们依然会归纳、总结国内外的相关实证研究成果。

1.2 法律框架

在联邦层面上，《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社会法典第八部 SGB VIII ）对德国儿童日间托幼机构（及儿童日间看护服务）的任务作出了规定。其中第22条第2款规定，首先，儿童日托机构（及日托服务）应当把儿童培养成具有独立性、责任感和集体意识的个体；其次，它们应当为家庭教育提供支持和补充；第三，它们应当帮助家长更好地实现工作和子女教育之间的和谐兼顾。通过上述任务的描述可以看出，立法者既重视儿童的健康成长，同时也将家长的视角纳入关注的范

围。

在质量标准方面，《日间托幼设施扩建法》（TAG）引入了更多的质量保障规定（《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KJHG 第22a条第1款）。根据这一条文，托幼服务的承担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对所提供服务的质量予以保证和进一步提高，对托幼质量进行评估，并制订相关的教育方案。除了联邦层面的这些“应当”性（因此也是非强制性）规定之外，各联邦州还在相应的州立法律或行政规定中，对托幼机构的教育质量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规定。这一方式符合德国作为联邦制国家的国情，因为联邦一级不得就质量标准做出具有全德约束力的详细规定。根据贝塔斯曼基金会“联邦各州儿童早期教育体系监测系统”提供的信息，有九个联邦州在《社会法典第八部 SGB VIII》第22a条之外，还对本州所有托幼机构教育质量评估的义务作出统一规定，而其他几个联邦州[8] 最多只是对此提出了一些建议。至于具体的评价方式（内部评价/外部评价）以及所采用的评价方法，各个联邦州 的要求和规定也相差很大（参阅贝塔斯曼基金会2016，2015年3月版）。

在所有联邦州的州法或条例中，都有对于“师生比例”的建议，部分联邦州还对“班级最大规模”提出了建议，并根据儿童年龄进行分组（Viernickel et al. 2015）。而大多数联邦州都对托幼机构管理层专业人员的工作小时数进行了规定，尽管各州在这一规定的内容上有很大差别。有些联邦州对“管理层免除从事专业工作的范围”做出明确的规定，其他一些州对此则只有“适当范围”的含糊表述（贝塔斯曼基金会2016，2016年5月版）。

早在几年前，各联邦州就达成了一致意见，针对儿童的早期教育制定出规划。迄今为止，所有联邦州均已制订出各自的教育规划。但对各州的规划内容进行分析之后，我们却发现其中的差异很大：部分联邦州在规划中设定了较为具体的项目，而其余联邦州在其规划中则仅仅明确了相关的教育领域（参阅Diskowski 2007）。尽管大多数联邦州都要求托幼机构证明在自己的方案中采纳了该州的教育规划；但没有一个州从法律上规定每年要对规划的落实情况进行年检（贝塔斯曼基金会2016，2008年12月版）。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对托幼机构的质量规定存在地区性差异，因此德国各地托幼机构的质量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此一来，单就家庭安在哪里这一点，就已决定了这家的孩子可以获得何种质量的托幼服务。关于家庭的社会经济条件又在多大程度上造成、或与地域差异共同导致儿童入托的质量差异，我们将在下文中详述。

此外，我们还发现，德国关于托幼质量的讨论，包括关于托幼教育规划的讨论，主要关注的是如何促进儿童的成长。当然，作为核心议题，这无疑应当成为讨论的重点。然而，在德国关于托幼机构质量标准的讨论中，很少会从家长的视角去思考和分析，而他/她们的幸福感本身可能会具有独特的价值。况且，家长的幸福感也会对孩子的成长和幸福感产生影响。因此，这些视角将成为本研究讨论的重点。

8 这些联邦州包括巴登-符腾堡州、不莱梅州、黑森州、下萨克森州、萨尔州和萨克森州，此外缺少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相关信息。

二

概念框架

决定送孩子进入哪家托幼机构，或者说哪家特定质量的托幼机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我们发现，家长在做出让子女进某个托幼机构的决定时，可能原则上与托幼机构的质量无关，而是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才会决定该机构应当具备哪些质量。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是先后做出的。不过，决定也可能是同时做出的，也就是说，只有当某家托幼机构既能达到家长所预想的质量标准，同时又有入托名额时，家长才会决定把孩子送去这家托幼机构。当然，如果托幼机构无法达到家长预想的质量水平，他/她们便会做出放弃送托的决定。而这样的决定做出后，导致的结果可能是由家长自己照看孩子，并且推迟重新进入职场的时间——如果他们还想工作的话，或是减少入职后的工作量。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家长转而选择其他托幼形式，比如由祖父母或其他人代为照料，当然前提是这些人有时间来照顾孩子。

然而，上述几种基本的决定选项并非能为所有家庭所用，家长在面临一些特定的情形时会另做抉择。比如在某些低收入家庭中，家长出于经济能力的原因必须出去工作，他/她们只能把孩子送去托幼机构——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发生在单身父母身上或者父母工作不稳定的家庭中。即使托幼机构的质量不符合他们的设想，家长也不得不在质量方面作出妥协（参阅Ross & Paulsell 1998）。此外，经常需要作出质量方面妥协的情形还有，当托幼机构的入托名额太少，家长只能在少数几个托幼机构之间作出选择或者根本没有选择的时候。[9]

不管上述什么情况，家长和专家对各个质量特征的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这些质量特征对他/她们作出判断时所起的作用也就不尽相同。总体而言，从教育学角度分析，托幼机构的质量可以分为五个维度（请见方框一）——它们首先被分为教育维度和非教育维度两个大类。通常，专家们关注的是会影响儿童成长的四个教育维度：结构质量、过程质量、取向质量和家庭关联度。而从家长的角度来看，非教育方面的质量也是一个重要的维度（请见方框一）。尤其当子女的入托与家长的工作紧密相连时，家长可能就不得不在几个教育质量特征与非教育质量特征之间进行权衡和取舍。

2.1 质量选择的决定因素

无论是决定送孩子去哪家托幼机构，还是决定托幼机构应达到何种质量，都取决于家长及孩子两方面的诸多因素。而家长和孩子则拥有不同的资源和能力来左右这些决定（参阅Chaudryet al. 2010；Meyers & Jordan 2006；并参见下图）。我们可以认为，家长会根据自己孩子的能力、发展程度和健康状况寻找一定质量的托幼机构；他/她们可能会优先选择那些在促进儿童某方面发展具有特色的机构。除了儿童特征之外，上述决定还取决于家长的社会经济特征（请见下文）。

9 在谈到其他类型的家庭以及德国的状况时，人们经常会提及这一论点。常见的理由是，家长因为缺少入托名额而常常没有选择余地，只能有什么上什么。尤其在论及三岁以下儿童的入托问题时，这一观点更具代表性。不过，随着2013年8月起年满一周岁的儿童均享有入托名额成为合法要求，以及由此带来的过去几年托幼机构数量的增加，这一问题如今已不再像几年前那样紧迫了。在一项针对德国的典型问卷调查中，对拥有托幼阶段孩子的家长调查得出，只有不到10%的家长称自己在孩子入托时没有选择余地（参见本文第3.1节）。

方框一：
托幼机构质量的教育维度和非教育维度

→ 教育质量

托幼机构的质量包括多个维度，这些维度可以采用不同方式来划分。按照“结构–过程模式”，教育质量可分为以下四个部分（Kluczniok & Roßbach 2014）：过程质量、结构质量、取向质量、家庭关联度及网络关系。

*过程质量*包括儿童和保教人员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之总和，以及儿童从社会环境和物质环境中所获得的经历和体验（Kuger et al. 2016）。对过程质量的测量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费用，因为测量大多需要经过长期的观测，并使用标准化的评估量表来进行（比如幼儿园质量评估量表，Tietze et al. 2007）。

*结构质量*的概念则涵盖了托幼服务的各种框架条件。这些条件往往有法律上的明确规定，所以测量起来相对较为容易（Kuger et al. 2016）。其中既包括班级规模、保育比例（即师幼比例）、托幼机构人员的职业资格和培训/继续教育等，也包括不同的设施特征，比如入托名额的数量、可供使用的游戏器材和学习材料等。此外，另一个重要的结构指标是班级的组成结构，既可以以儿童的年龄，也可以以他/她们的能力为标准来划分（如Justice et al. 2011）。不过后者很少被纳入测量范围，因此在实证调查中，研究人员往往试图借助民族成分来反映儿童的能力，尤其是他们的语言能力。

*取向质量*包括托幼服务人员的期望、观点、规范标准和价值观（如Hayeset al. 1990；Tietze 1998）。此外，取向质量还包括托幼机构如何组织其教学活动，以及采取哪些措施来保证教育质量（Tietze et al. 2013）。

*家庭关联度/网络关系*指的首先是托幼机构与家长之间的合作，及其与其他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合作（Kluczniok & Roßbach 2014）。

结构–过程模式的一个假定是，上述的每个质量要素都会对儿童及其家庭产生影响，而其中的过程质量因为能部分地反映出或主导其他几个质量要素所产生的影响，因而在所有质量要素中占据核心地位。与此相应，那些针对儿童早期教育和照料服务对儿童成长产生哪些影响的科学调查，除了结构质量以外，也特别将过程质量纳入了关注的范围。而结构质量的各项指标和过程质量之间呈正相关性，并且通过过程质量的若干特征间接地反映出其对儿童认知能力和社会能力的影响，对此已有实证研究结果予以支持（Cryeret al. 1999；Kuger & Kluczniok 2008；儿童早期照料研究网络NICHD 2002；Phillipsen et al. 1997）。结构–过程模式关注的焦点是，托幼服务的质量如何影响儿童的成长。

→ 非教育质量

在分析人们对托幼机构的选择及其对儿童和家长的幸福感可能产生的影响时，除了教育质量的四个维度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特征也不应忽视。这些特征主要包括托幼机构与住所之间的距离远近、托幼机构的开门时间、每天的服务时长、托幼机构运作的灵活性和可靠性、以及托幼费用等。[10]

10 有大量关于托幼费用作为非教育质量组成部分的国际性研究，但在本文的参考文献中并未提到。和英美两国相比，德国的托幼费用要低得多，因此其重要性相对较低。但这并不表示德国家长在送孩子上托幼机构时不会考虑到费用（参阅Müller et al. 2013）。

再则，儿童和家长的特征也会影响到家长对托幼机构某一特定质量的偏好和态度，以及他/她们对托幼质量的了解程度（参阅Chaudry et al. 2010；Meyers & Jordan 2006；此外请见图一）。换言之：无论是家长的偏好，还是他们在选择托幼机构时所掌握信息的数量与质量，都会随着家长特征的不同而发生系统性的变化。

我们在此以三个家长特征为例，它们对本文第四章具有很高的关联度：*财力资源、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和移民背景*。在追求全体儿童享有同等教育机会的目标背景下，这些特征显得非常重要。

财力方面的限制，会使低收入家庭只能选择费用低廉的托幼机构（参阅Mason & Kuhlthau 1992）。不过在德国，家庭收入的重要性处于次要地位，因为公共财政会对托幼机构提供资助，因此和其他国家相比，德国家长所交的托幼费用相对较低，并且在同一个乡镇或社区之内，费用相差不大。[11] 此外，托幼费用往往还会根据家庭特征——如家庭收入，或入托儿童的数量得以调整。对德国而言，具有更大潜在意义的考虑是：财力因素会对家长获取信息的可能性产生影响，这些信息包括托幼机构各种质量特征的重要性、以及某家托幼机构的质量如何。高收入家庭更有能力通过使用付费的、非正规的儿童照料方式来节省出时间，并利用这些时间来寻找“优质托幼机构”。

谈到家长的受教育程度，我们发现，家长对子女接受教育的渴求程度会随着家长教育水平的差异而发生变化；同时，具有不同教育水平的家长对不同（非）教育质量标准的重视程度也会不同。此外，家长的受教育程度也关乎他/她们是否了解德国教育和托幼体系是如何运作的，儿童早期教育意义的意义何在，以及该如何最有效地了解一家托幼机构的质量。而这又会进一步体现在不同教育水平的家长群组在寻找托幼机构时的行为差异上（如寻找的时间节点、信息来源等）（Vandenbroeck et al. 2008）。

此外，我们可以认为，来自不同文化圈、具有移民背景的家庭对各个质量要素的重视程度也有所不同，比如育儿人员的特征（如跨文化交流能力）和机构的总体特征（如班级学生的民族构成）。和家长的教育背景一样，文化背景同样会对家长寻找托幼机构的行为、以及他/她们对托幼领域总体状况尤其是德国托幼体系的了解程度产生影响（Klein et al. 2016）。此外，文化障碍——比如语言障碍——也会影响家长对信息的获取，并妨碍家长使用相应策略让子女成功入托（Vandenbroeck et al. 2008）。

综上所述，由于家长自身及其子女掌握的资源不同，他/她们在寻找和使用高质量的托幼机构时，动力和能力也就不尽相同。这可能使托幼机构的质量产生系统性差异，这些差异影响着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儿童，最终可能导致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产生社会经济差异。

2.2 质量对家长的影响

大量研究证明，良好的教育质量对儿童成长极其重要，并对儿童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优质托幼也会提高儿童的主观幸福感。而本研究关注的焦点，正如前文所述，在于托幼质量对家长可能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在职业和家庭的平衡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在图一的右边列出了最重要的家长特征，这些特征有可能受到其子女所在托幼机构质量的影响。这些家长特征又可分为：与家长、尤其是母亲工作相关的特征，以及与家长、尤其是母亲的主观幸福感（比如通过测量其心理健康水平得出）相关的特征。

很显然，各种非教育质量的特征会对家长的职业、当然也对家长的主观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比如，灵活托幼时间或所谓的弹性托幼时间可以让家长更容易做到工作与家庭两不误（参阅Schober & Stahl, 2016）：如果托幼机构的开放时间更长、作息安排妥当可靠、所处的地理位置又便捷有利，那么这些都有助于家长更好地应对工作中面临的各种要求，从而提高他/她们对职业和家庭平衡的满意度。而无论家长是否就业，这些非教育质量特征总是能对家长的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因为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也能让他/她们从容安排职业以外的其他任务、职责或业余活动（参阅Schober & Stahl, 2016）。相反，如果托幼机构的开放时间太短，作息安排不当，使家长不得不安排额外的保育人员或者亲自照管孩子，那么这些家长可能会感到压力倍增、产生不满或消沉的情绪。

此外，除了托幼机构的非教育质量特征，其教育质量特征也会对家长的工作特征和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比如教育质量会影响家长对托幼机构的满意度。如果父母对托幼机构的教育质量也感到满意，并认为自己的孩子能够在那里受到良好教育的话，那么这首先会

11 这里不包括私营托幼机构，不过此类机构在德国的托幼机构中只占极少份额。此外还可参见施罗德Schröder等人（2015）。

有助于家长做出重返职场的决定，其次可以延长他/她们的日工作时间，第三可以提高他/她们在工作中的劳动生产率（参阅Vandell & Wolfe, 2000）。相反，如果家长觉得托幼质量达不到自己的要求，就可能导致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下降，工作时间缩短，甚至重新退出职场。相应地，从中长期来看，由托幼质量造成的职业发展的不连续性，会对家长的工作收入和薪酬产生负面影响（参阅Ross & Paulsell, 1998）。

原则上来看，好的教育质量可能导致家长不再那么重视花时间来陪伴子女：他/她们会认为，由于托幼质量非常高，那么自己对子女的时间投入相对而言就不那么重要了。不过，优质托幼也可能激发家长更大的动力，使他/她们投入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子女。

如果托幼质量较差，则会削减家长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或对特定领域——如家庭和工作——的满意度（参阅Ross & Paulsell, 1998），比如劣质托幼对孩子的负面影响，会体现在孩子回家后的表现上。由此产生的后果，可能是家长在寻求家庭和工作的平衡中产生的角色冲突，也可能是做出让孩子退出托幼机构的决定。由此造成的压力会对家长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都带来不利影响。

因此我们看到，家长对托幼机构的质量评价和满意度，在托幼质量和家长的幸福感及就业行为之间的关系中，理论上可以起到调和或缓和的作用。不过撇开这一考虑，家长对托幼机构的满意度也可以作为独立的幸福感衡量标准。无论何种情况，在诸多质量因素中，家长无疑首先会受到那些易于评判的质量因素的影响，其中首先包括托幼机构的非教育质量特征。而对于托幼机构的教育质量，家长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则更多地取决于其本人的积极性和判断能力，以及托幼机构人员提供的信息、或从外部机构获得的评估意见。

这里所列的各种关系不仅有相互之间的影响，而且还会给家庭的资源配置（比如家庭收入）带来后果（参见下图）。例如，以优质托幼为前提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带来工作中的晋升机会，工资收入也会随之提高。此外，儿童成长会对父母产生影响，而家长的就业和幸福感反过来也会影响儿童的成长。这就是为什么托幼质量会对儿童的成长产生间接影响，并使其他关联更加紧密。有大量研究表明，家长、特别是母亲的就业会对儿童成长产生影响（参阅Brooks-Gunn et al. 2010；Han et al. 2001）；也有实证研究证明，家长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对儿童成长产生积极影响（参阅Berger & Spieß, 2011；Goodman, 2007；Lovejoyet al. 2000）。

图一：
托幼质量选择过程及影响分析的概念框架

来源：自制

三

家长的质量评价
——国内外实证研究观点介绍

3.1 对不同质量维度的偏好

正如我们在概念部分所介绍的，家长对各种质量维度有着不同的偏好。国外和国内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比如有多项美国研究称，拥有大学学历的母亲会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母亲更加重视托幼机构的教育质量特征（Johansen et al. 1996；Kensinger Rose & Elicker, 2008）。对此，施雷等人（Shlay et al.2005）在一项针对美国低收入家庭非洲裔家长的抽样调查中也发现，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母亲会优先选择那些能使儿童获得更多个别照料的托幼机构。如果教学课程包含有计划的学习活动和游戏活动的话，她们也愿意为此花更多的钱。

但同时也有人指出，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母亲对托幼机构的非教育质量特征也更为重视，比如托幼机构的位置、费用和开放时间等（Johansen et al. 1996）。比利时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母亲而言，托幼机构的位置和质量并没有像对高学历家长那么重要（Vandenbroeck et al. 2008）。此外，一些美国的调查研究还发现，在高收入或高工资与较强的教育质量偏好加上次强的非教育质量偏好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Johansen et al. 1996；Peyton et al. 2001）。在比利时的研究中发现，与非少数族裔家长相比，少数族裔家长更不重视非教育质量特征，比如托幼机构的开放时间（Vandenbroeck et al. 2008）。[12]

而对德国数据的分析结果则显示，德国家长在选择托幼机构时，既重视非教育质量方面，也重视教育质量维度。2013年，德国社会经济调研项目（SOEP）一项名为K²ID-SOEP（德国儿童托幼）的附加研究项目显示，家长在选择托幼机构时，离家近是首要决定因素：在被访者中，有将近80%称托幼机构与住所或工作地点的距离近是最重要的五大选择理由之一（请见表一）。另一个主要的选择理由是托幼机构每天的开放时间——不过也有超过50%的被访者表示，托幼机构的教育方案也是五大选择理由之一。

在根据家长的教育背景对这些数据进行进一步分析后，我们还发现：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长相比，拥有大学学历的家长在选择托幼机构时更有可能将教育质量（如托幼机构的师幼比例、教育方案）作为最重要的选择标准。相对而言，他/她们认为其他质量特征（如离家或工作单位的距离、开放时间）的重要性要低一些（Stahl et al. 2016）。此外，一项针对德国西南部地区的数据研究（ESKOM-V：“移民家庭儿童语言与文化能力的获得”）表明，与有移民背景的家庭相比，没有移民背景的家庭更多将质量作为自己选择托幼机构时的重要标准（Klein et al. 2016）。

此外，从每年公布的“儿童促进法案（KiföG）实施评估报告”中，我们也可看出家长对特定质量要素的偏好：在所有被访的0-3岁儿童家长中，有41%希望能得到全日制托育名额（德国联邦家庭、老人、妇女和青年事务部，2015）。在“U3社区需求调查”项目对各区青少年管理局进行调查时发现，托幼机构现有的每日提供照料的时间往往与家长的偏好不相符：平均来看，每周提供照料时间在35小时以下以及在36到44小时之间的托幼名额不足，而每周提供照料时间在45小时以上的托幼名额则过多（Fuchs-Rechlin et al. 2014）。

除了每日照料时间的长短之外，许多家长认为，一

12 此外，加拿大和意大利的研究也显示，家长在对其子女的托幼机构进行评价时，所采用的质量要素以及灵活性和实用性/针对性是不同的（Lehrer et al. 2015；Scopelliti & Musatti et al. 2013）。

表一：
父母给出的选择托幼机构的原因

原因	类别	最重要的原因		5大最重要原因之一	
		% 原因	% 类别	% 原因	% 类别
离住所/家/工作单位近	非教育质量/实用性	42,5	65,1	78,3	88,1
每日开放时间		9,9		53,4	
兄姐在同一家托幼机构		12,6		36,5	
班级规模/每位托幼教师需要看护的儿童人数	教育质量	4,6	23,7	41,2	79,2
托幼教师的培训		2,5		26,5	
具有不同背景来源的托幼教师		0		2,6	
游戏/教学材料的配备，花园或室外场地		3,3		58,9	
教育方案		13,2		54,5	
家长是否可以参与决策		0,2		7,9	
有其他家长/熟人的推荐	其他	2,6	11,2	27,2	35,7
没有其他选择		8,6		8,6	
总和		100	100		
数量（N）		795		799	

备注：结果经过加权处理。资料来源：2013 K^{2}ID-SOEP 家长问卷调查[13]（数据由笔者计算得出）

家托幼机构开园和闭园的时间点也很关键：在德国西部地区的城镇中，有2%-20%的家长称上午7点之前需要托幼服务，有3%-25%的家长称下午17点之后仍需托幼看护。而无论托幼服务涵盖的时间范围如何，有超过80%的家长希望托幼机构可以提供午餐（同上）。总体而言，家长注重得到持续稳定的托幼解决方案，并希望托幼服务种类以及对应的各类教职人员数量能少一些（Klinkhammer 2008）。

更早一些的德、美两国比较研究证明，德国托儿所适龄儿童（三岁以下）家长最为重视的是孩子和保育人员及其他孩子之间的互动（Tietze & Cryer, 2004）。而对于德国幼儿园适龄儿童的父母来说，是否有儿童活动场地以及幼教人员与孩子之间的沟通方式则是他们最为重视的质量特征（Cryeret al. 2002）。因此，托幼服务人员的素质就显得尤为重要（Pungello & Kurtz-Costes, 1999）。在德国青少年研究所（DJI）的“德国部分联邦州灵活及扩展式托幼工作的发展”项目所做的群组讨论和访谈中，家长们还强调指出与保育人员之间信任关系的重要性，他/她们期望在教育问题中也可以得到后者的部分帮助（Klinkhammer, 2008）。这一结果与德国青少年研究所之前在全联邦范围内开展的名为“儿童之地”的示范项目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后者称，家长把托幼机构也看作是一个沟通场所，他/她们在这里不仅可以和其他成年人交流意见，而且也能更好地满足自身的需求（Ledig et al. 1996）。

克莱因等人（Klein et al. 2016）在报告中指出，德语水平较低、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长不太会选择离家较远（但质量可能更好的）的托幼机构，而更愿意选择离家最近的那家。此外他们还观察到，如果在离家最近的幼儿园中，有移民背景的儿童比例越高，那么那些有移民背景的家长选择这家机构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而没有移民背景的家长选择这家机构的可能性则会越小。

3.2 对不同质量维度的满意度

尽管每位家长对不同质量要素的重视程度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国内外研究均指出，家长对自己孩子所上托幼机构的满意度还是很高的（例如Britner & Phillips, 1995；Leach et al. 2006；Lehrer et al. 2015；Peyton et al. 2001；Scopelliti & Musatti, 2013）。

在德国，“儿童促进法案（KiföG）实施评估”报告介绍了0-3岁儿童的托育状况。报告称，家长对托育服务打出的平均分数为“良好”（Alt et al. 2013）。从2009-2014年，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的托育机构儿童家长比例处于85%-91%的区间内（德国联邦家庭、老人、妇女和青年事务部，2014，2015）。

与“儿童促进法案（KiföG）实施评估”系列报告不同，穆勒等人（Müller et al. 2013）把考察范围扩展到更大年龄段儿童的家长（0-6岁）。不过在其2010年的分析报告中也可以看到，儿童家长对托幼机构表示出了相当

13 有关 K^{2}ID-SOEP 家长问卷调查，请参见卡梅尔等人的报告（Camehl et al, 2015a）。

高的满意度：各个评估单项的平均满意度——在从0（完全不满意）到10（完全满意）的评分条上——均处于7-8之间，其中只有对入托费用满意度的平均值较低，为6.1。

德国社会经济专家组（SOEP）的K²ID-SOEP（德国儿童托幼）附加研究项目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Camehl et al. 2015b）。除了托幼费用——这一项的家长（非常）满意度同样是最低的——之外，机构与家长的合作这一项的满意度相比而言也较低。值得注意的是，从统计数据来看，在所考察的各个质量维度中，幼儿园儿童父母对其中一半质量维度的满意度，较之0-3岁儿童家长明显要低。而家长对不同质量要素的满意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她们是如何评价质量的。从总体满意度来看，关键在于家长的各种愿望是否得到了关照。该项目的结论与国外的相关研究结果一致，即托幼机构在满足家长愿望方面提供的支持和家长对托幼机构工作的参与可以提升家长的满意度（Britner & Phillips, 1995；Scopelliti & Musatti, 2013）。相反，家长对子女所上托幼机构的总体满意度——根据卡梅尔等人（Camehl et al., 2015b）的研究——和家长支付的托幼费用之间没有关联。

3.3 家长在质量评价时的信息缺失

一方面，家长对其子女所送的托幼机构表示相对满意；而另一方面的调查却发现，专家们对德国儿童托幼机构的质量只给出了中等水平的评价（参阅Tietze et al. 2013）。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家长质量评价和专家质量评价之间的偏差究竟有多大。此外，家长对托幼机构质量的看法也和托幼机构从业人员的看法有所不同。这也进一步佐证了，家长在评价托幼质量时存在信息缺失的问题。不过，家长一般不会认为自己所选择的是一家较次质量的托幼机构，也不会认为自己在评价该机构的质量时会弄错（参阅Camehl et al. 2015b）。对于家长、专家及托幼从业人员这三者对托幼机构质量评价之间的偏差，已有人根据国外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分析。

在美国所做的一次大规模托幼机构儿童家长调查中，克莱尔和布齐纳尔（Crayer & Burchinal, 1997）得出结论称，和经过培训的观察员相比，家长对子女所上托幼机构的质量特征总体评价过高。相应地，家长和观察员在评价具有很高过程质量的机构群组时，相互间的差异也就最小。此外，对于家长易于观察到的质量标准，双方的评价结果差异也很小（比如托幼机构的硬件设施）。莫坎（Mocan, 2007）在对同一组美国数据进行相似的分析后，也得出结论称：家长比经过培训的观察员更容易高估质量。此外他还发现，家长对托幼机构的某些特征产生曲解，将其视为良好质量的标志，尽管这些特征和教育质量并无关联。另一项对美国和德国数据的比较分析得出结论称，德国的家长也一直对自己孩子所上托幼机构的质量给予了过高的评价——不过，德国在这方面的差异要比美国小（Cryer et al. 2002）。

希腊所做的两个研究项目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即家长对子女所上托幼机构的教育和照料质量的评价过高（Grammatikopouloset al. 2014；Rentzou & Sakellariou，2013）。不过，格拉玛狄克普洛斯等人（Grammatikopouloset al. 2014）同时发现，对不同质量特征过度评价的程度相当稳定：对于被经过培训的观察员评分最低的那些质量特征，家长也打了最低分，反之亦然。来自瑞典的研究显示，那些被经过培训的观察员列为较高质量等级的托幼机构，其在机构组织、促进儿童成长和从业人员教育水平及总体质量等方面来自家长的得分也更高（Kärrby & Giota, 1995）。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呈现为中等强度：即当涉及子女托幼质量时，家长具有中等水平的评判能力。加拿大针对托幼机构中四岁儿童家长做过一项抽样调查，莱勒等人（Lehrer et al. 2015）发现，在所考察各质量维度的子量表上，由经过培训的观察员给出的分数和家长满意度之间，存在小到中度的相关性。不过这里的研究也得出明确结论：与经过培训的观察员相比，家长对托幼机构质量的评价是过高的。[14]

托夸蒂等人（Torquati et al. 2011）在研究中使用美国的一组数据，其中也包括了经过培训的观察员和家长评价托幼机构质量的相关信息。从观察员对项目质量的评价中很难预测出家长的评价。当然两者的相关性强度不高，这表明家长和观察员的观点吻合度是有限的。另外一项新西兰的研究也把家长对不同托幼质量维度的满意度与经过培训的观察员的质量评价放在一起进行考量（Barraclough & Smith, 1996）：但该报告无法在家长评价和观察员评价之间建立起有意义的关联。另一项对44家有四岁儿童的加拿大托幼机构所做的调查显示，家长对具有高资质的保教人员总体评价过高，而对低资质保教人员的评价则过低（Howe et al. 2013）。

---

14 厄瓜多尔的一项大规模幼儿园儿童研究项目得出同样的结论，即家长对自己子女的教育人员/教师的评价几乎全都是好或非常好（Araujoet al. 2016）。不过，家长对有经验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和学生有更好互动、更能提高学习成绩的教师的评价平均来说会更高。然而，尽管意识到教师质量的差异，家长们也几乎不会采取相应的家庭教育措施来促进孩子的成长。

也有少数研究对家长的质量评价和托幼机构工作人员的质量评价进行了对比。比如巴罗斯和里尔（Barros & Leal, 2015）在研究中选择的是1-3岁儿童的家长、独立观察员及葡萄牙托幼机构保教人员的质量评价。结果显示，家长和托幼机构专业人员对托幼质量的评价明显高于观察员的评价。但是，三方评价之间的相关性一般，其中观察员和托幼机构专业人员之间的一致性要高于观察员和家长之间的一致性。同样，卡梅尔等人（Camehl et al. 2016）基于德国K²ID-SOEP的研究结果也发现，家长质量评价和托幼专业人员质量评价之间的差异更大一些。但是，不同质量特征的差异程度相差很大。在那些家长易于观察到的特征上，家长和托幼专业人员之间的差异要小一些。不过，差异程度的大小和家长的社会经济背景以及托幼机构的其他特征无关。

总体来说可以认为，家长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其子女所上托幼机构的质量，而且家长的质量评价与经过培训的观察员或托幼机构工作人员的评价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然而跨国研究项目的结果显示，与经过培训的观察员相比，家长对托幼质量通常会给予过高或是不同的评价。

四

哪些人在使用哪种质量的托幼机构？托幼质量与家长社会经济特征之间的关联

除了大量对托幼机构的选择性使用进行分析的调查研究之外（参阅Schober & Spieß, 2013；Schober & Stahl, 2014），目前也有许多国外和部分德国国内研究项目对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如何使用具有特定质量特征的托幼机构进行调查和分析。

4.1 国际上的研究成果

迄今为止，国际上针对家庭社会经济特征与家庭所使用托幼机构质量之间系统相关性的研究得出了五花八门的结果。差异不仅存在于所分析的不同国家之间，而且也取决于调查所涉及托幼机构的具体质量维度和家庭的具体社会经济特征。在这里，我们将介绍其中部分研究成果，而不是涵盖所有的国际性研究。

根据美国对十个地区890名儿童所做的抽样调查，麦卡特尼等人（McCartney et al. 2007）以 NICHD-SECCYD 数据（美国国立儿童健康与人类发展研究所---早期儿童护理和青少年发展研究）为基础，发现在过程质量和母亲的教育背景之间存在正相关。也就是说：受教育年限更长的母亲，其子女所上托幼机构的过程质量要高于平均水平。皮安塔等人（Pianta et al. 2002）对同一样本中的223个孩子进行分项抽样研究，结果同样发现，从统计数据来看，在更高的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和更高的托幼机构过程质量之间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关联。不过当考虑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并进行多变量分析时，基于0-15个月儿童的相关数据，研究人员并不能断定在过程质量和母亲的教育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性（NICHD 早期儿童护理研究网络，1997）。

在另一项研究中，博尔格和斯卡尔（Bolger & Scarr, 1995）对美国三个制订了不同最低法定标准的联邦州120所托幼机构中的636名儿童进行了调查。他们采用过程质量和结构质量的综合质量值来反映托幼机构的质量。结果同样显示，在更高的托幼质量和家长的受教育年限之间存在明显的统计学意义上的正相关性。相反，在家长的职业地位、家庭收入和质量测量结果之间并不存在关联。

与此相反，卡洛里等人（Karoly et al.,2008）在“RAND加利福尼亚学前教育研究”中，针对加利福尼亚托幼机构中的615名儿童，对托幼机构的多项结构及过程质量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并未发现在母亲的高学历和其子女所上托幼机构的质量之间存在关联。相反，同一数据证明：有移民背景儿童所上托幼机构的过程质量平均略低于父母生于美国的儿童所上的托幼机构（Karoly & Gonzalez, 2011）。

此外，有些美国研究人员在报告中称，在家庭收入和托幼机构质量之间存在U型的关系（如 NICHD 早期儿童护理研究网络，1997）：来自富裕和穷困家庭的儿童所上托幼机构的质量平均而言更好一些，而那些收入刚刚位于贫困线之上家庭的儿童所上托幼机构的质量是最差的。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U型关系只在部分质量指标上可以观察到。尽管如此，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儿童所上托幼机构的质量平均而言是最高的（Dowsett & Huston, 2008；Phillips et al. 1994）。

尤其在过去几年中，一些研究开始关注托幼机构中的社会群组成分，并将其看作结构质量的一部分。针对这一质量指标，不同托幼机构似乎也存在明显差别。比如瑞德等人（Reidet al. 2015）在针对美国的研究报告中提到，在其所调查的2966名儿童中，大多数人所在的托幼班级不仅是根据家长的社会经济地位、而且往往也是根据民族来划分的。

根据《千禧世代研究（Millennium Cohort Study）》，一项对英国628个家庭和299家托幼机构所做的调查得

出结论称，来自经济弱势家庭（即单身父母的子女，父母均无工作的儿童，住在租赁房屋中的儿童[15]）的儿童所上托幼机构的过程质量要高于来自富裕家庭的儿童所上的托幼机构（Matherset al. 2007）。据作者推测，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更多上的是公立托幼机构，而这些机构所聘用的都是经过教育专业培训的教育工作者/教师。

一项基于英格兰地区20多万名儿童的“学校普查和幼儿普查（Schools census and Early Years census ）”数据的最新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来自贫困居住区（根据“收入丧失影响儿童指数（income deprivation affecting children index）”来测算）的儿童所上的托幼机构更多会配备至少一名经过教育学专业培训的专业人员和/或一名“幼儿专业人员（Early Years Professional）”（Gambaroet al. 2015）。同时，其他针对英国教育标准办公室（Ofsted）质量评价的分析则显示，来自社会弱势群体居住区的儿童所上托幼机构的过程质量更低（Gambaro et al. 2015；Ofsted 2012）。

4.2 德国国内的研究成果

迄今为止，德国国内针对托幼机构质量社会经济差异的调查相对较少。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学者们首先指出，在有移民背景和没有移民背景的儿童所上托幼机构的质量之间存在差异。

结构质量和过程质量

一项对巴伐利亚州和黑森州96所幼儿园的543名儿童所做的分析（BiKS研究——“学前和学龄儿童的教育过程、能力发展与选择决定”）得出结论称，有移民背景的儿童（即至少父母一方的母语不是德语）和没有移民背景的儿童相比，只有大约一半的概率会上高质量的幼儿园（Lehrl et al. 2014）。在所调查的两个过程质量指标中，有一个存在上述模式，而且即使考虑到其他社会背景特征，这一模式也依然存在。相反，研究者在托幼机构质量与母亲的教育程度之间、以及与家庭中父母的最高职业声望之间并未发现关联。

库格尔和克鲁茨尼奥科（Kuger & Kluczniok, 2008）在用多变量分析方法对相同数据进行研究时发现，有移民背景儿童比例较高的幼儿园班级的过程质量普遍更低。但是，移民背景儿童的高比例又和结构质量的部分指标之间存在正相关，比如班级规模更小、师幼比例更合理等。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巴伐利亚和黑森两州在资助托幼机构时为有移民背景的儿童提供了额外的资源（参阅Hogrebe, 2014）。

而对NUBBEK（儿童早期教育、照料和培养国家研究项目）数据的分析也可发现同样的关联。该项目对8个联邦州中567个日托班级的质量进行了调查，这些班级共有1956名2-4岁的儿童（Tietze et al. 2013）。贝克等人（Beckh et al. 2014）在对其中534名2岁的日托儿童所做的抽样调查中发现，虽然过程质量较高的班级中儿童的社会经济地位平均而言高于中等质量班级儿童的社会经济地位，但二者的相关性较低。提策等人（Tietze et al. 2013）还发现，在其调查的265个“幼儿园班级”和240个“托儿所班级”中，拥有移民背景儿童（根据母亲或父母的母国来定义）比例高（≥67%）的班级的过程质量，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要低。

在对德国国家教育调查研究（“NEPS”，第二组“幼儿园”）所做的全国幼儿园典型抽样调查进行多变量分析后，结果显示，并未测量到德国幼儿园在结构质量特征方面——比如班组规模、师幼比例和教师进修频率等——存在社会经济差异（Becker & Schober, 2015）。不过分析也显示，教育水平较低的家长以及非以德语为母语家庭的孩子所在的托幼班级更少举办特定的活动，比如郊游。此外，这些孩子所在班级配备的游戏设施和材料也更少一些。

贝克尔（Becker, 2010a）在其报告中也指出，德国西南部某地区有土耳其移民背景的儿童（即至少父母一方或祖父母一方在土耳其出生）所上幼儿园的软、硬件设施质量要低于德国儿童所上的幼儿园。这些数据来自ESKOM-V（学龄前移民儿童语言与文化能力的获取）项目，包括了466个德国家庭和440个土耳其家庭的子女信息。另一项针对1084个家庭的数据调研结果（Becker, 2010b）表明，拥有大学毕业学历的家长和在德国出生的家长较少选择移民背景儿童比例高的幼儿园。这一发现尤为重要，因为即便是考虑到居住区域的空间隔离——即当家庭所在区域中移民背景儿童的比例相近时，依旧可以得出上述结论。

而一项基于K²ID-SOEP（德国儿童托幼）附加研究项目的最新研究结果也显示，母亲教育程度较低以及具有（间接或直接）移民背景的儿童所上托幼机构的软、硬件设施数量更少（Stahl et al. 2016）。此外，对这些儿童而言更差的托幼条件还包括传统的结构质量特征，如班组规模、师幼比例和教师的进修/继续教育等。最终，母亲教育程度较低以及有移民背景的儿童会

15 在阐释这一特征时，需考虑到这项研究是在英国进行的。

更多地进入不以德语为母语儿童比例较高（至少30%）的班级（Stahl et al. 2016）。研究中也考虑到了家庭居住地的多个特征（例如，托幼机构中3-6岁儿童所在家庭的区域来源组成，以及居住区域的移民家庭数量等）。相反，在调查结构质量指标时，来自单亲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几乎没有遭遇统计学意义上的重大“短板”，也就是说，这些儿童所上托幼机构的质量并不会更差。该研究项目总计调查了德国（包括德国东部和西部地区）647所托幼机构的818名儿童。

另一项调查——基于奥斯纳布吕克6777名儿童的入校调查数据——则得出以下结论：和没有移民背景的儿童相比，父母不在德国出生的儿童所上的托幼机构的社会成分平均来看更为不利（Biedinger et al. 2008）。社会成分包括家长的教育背景及失业率、家庭结构以及儿童语言能力等多方面的信息。

取向质量和家庭关联度

前文所述的研究所考察的都是过程质量或结构质量指标。而在家庭背景与取向质量或家庭关联度之间、及其与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合作沟通之间的相关性方面，迄今为止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基于K²ID-SOEP（德国儿童托幼）附加研究项目的最新研究结果显示，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儿童群组中，有一部分会进入取向质量更低的托幼机构（Stahl et al. 2016）。相应的关联既出现在质量保障、教育工作的组织安排方面，也出现在托幼工作人员的满意度、工作热情及其对自身角色和托幼机构责任的认知方面。此外研究者还发现，对于单亲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来说，其家长在与园方合作方面存在“短板”。

就德国总体而言，首先，与没有移民背景的儿童相比，有移民背景的儿童所上的托幼机构的质量会更低一些；在父母教育程度较低的儿童身上，也有类似但不十分明显的发现。在家庭收入方面，德国的社会差距不像英美两国那么大，原因可能是德国的托幼收费制度是由政府调节并与收入挂钩的。

五

托幼质量如何影响家长？托幼质量、家长就业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在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中，对托幼服务与母亲就业之间的关系已有了大量的调查分析。然而很少有人研究托幼服务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母亲（和父亲）对家庭或日常生活的满意度，尽管最近几年陆续有研究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如Becker 2008；Brodeur & Connolly, 2013；Kroell & Borck, 2013；Schober & Schmitt，出版中；Yamauchi 2010），但这些研究都没有或很少考虑到托幼服务的质量构成，因此我们接下来将着重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5.1 国际上的研究成果

在关于家长（主要是母亲的）职业工作以及家长主观幸福感各个方面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托幼质量影响的相关文献中，绝大多数来自美国。其中有些研究聚焦于家庭与工作的和谐兼顾方面存在的冲突和满意度，后文中我们还将专门讲述这一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调查研究中，有些不仅考察了托幼机构的保育安排，而且还考察了其他托幼形式，比如儿童日间托管所或非正规的家庭外照料等。

除此以外，绝大多数研究仅仅考察了家长的质量评价结果，但没有追溯外部的信息源（比如专家评价或教育人员问卷调查等），而后者可能会对各托幼机构的教育质量和保育质量提供更为客观的认识。有少数研究除了考虑到其他所观察到的第三方变量之外，还运用了统计学方法。出于方法原因，这些研究无法针对儿童早期教育和保育质量对家长产生的因果效应进行分析，而大多只是分析了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过，尽管相关研究很少，但从中依然可以看出可能存在的一系列因果影响。

接下来，我们将把相关研究分成三组进行介绍：（1）托幼质量和家长就业、就业范围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2）托幼质量和家长对兼顾职业家庭满意度之间的关系；（3）托幼质量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家长的就业、就业范围与劳动生产率

美国的多项科学调查在对非教育质量标准进行研究时，将目光投向了当地托幼机构地理位置的远近及其与家长就业之间的关系。梅尔斯（Meyers 1993）对255位单身母亲进行了抽样调查并对结果作了分析，这些母亲均领取社会救济，子女年龄在13岁以下，并且是第一年参加融入工作岗位培训项目。梅尔斯在报告中称，如果托幼机构和融入项目之间的距离太远，那么这些母亲很可能会放弃参加培训项目。

与此相似，美国一项针对1565位学龄前儿童的母亲所做的抽样调查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如果最近的一所托幼机构离家的距离超过10分钟车程以上，那么她们很可能会放弃工作（Hofferth & Collins, 2000）。这一关联可以在挣取低水平小时工资和高水平小时工资的两部分母亲身上发现，但并不见诸于中等水平小时工资的母亲。[16] 另一项对321位正在就业且子女在3-4岁的美国家长所做的问卷调查则显示，在已婚母亲、单身母亲和已婚父亲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会在其他雇主提供距离工作岗位更近的托幼服务时选择跳槽（Goldberg et al. 1989）。

在托幼安排的稳定性方面，也有相关的研究成果。

16 这里所指的小时工资为潜在的估测值。

在国家层面关于“脆弱家庭与儿童幸福研究”（Fragile Families and child Well-being Study）项目所做的一次问卷调查中，研究人员发现，部分幼儿母亲曾经面临看护方失约的难题（Usdansky & Wolf, 2008）：在1309位未采用家长看护方式的受访母亲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称外部看护服务在上个月至少（在提前通知或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失约一次。将近一半的受访者称因此而未能去上班，尤其是那些很少得到其他亲属或熟人帮助的母亲。霍菲特和柯林斯（Hofferth & Collins, 2000）根据美国的调查数据发现，看护安排的终止——对笔者来说这是托幼稳定性的一项指标——会增加母亲放弃工作的概率。这一点适用于中等水平工资和高水平工资的母亲，但并不适用于低水平（潜在）工资的母亲。不过米勒（Miller, 2006）却认为，总体来看，托幼安排的不稳定性对幼儿母亲失去工作岗位的重要性有限。她的结论依据是其本人对美国三个联邦州2266名2-9岁儿童母亲参加的融入工作岗位培训项目的评估数据所做的分析。

其他一些研究则考察了家长对子女所上托幼机构的满意度指标。格林贝格和奥尼尔（Greenberger & O’Neil, 1990）对哥德堡等人（Goldberg et al. 1989）所用的同一问卷调查进行了分析，他们主要研究了托幼质量与家长对雇主单位的忠诚度之间的关系——其中托幼质量是由家长进行评价的。结果显示：父亲对托幼质量的评价越高，他们对雇主的忠诚度也就越高，然而这一关联效应并未在母亲身上体现出来。布法尔迪和爱德温斯（Buffardi & Erdwins, 1997）开发出一套用来测量家长对看护自己子女的教育专业人员满意度的全方位工具，其中包括了沟通力、可靠性和用心程度等多个维度。根据两项针对有年幼子女（平均年龄分别为1.5岁和2.3岁）的上班母亲所做的抽样调查，研究人员证实：如果家长对专业教育人员的用心程度更为满意，那么他/她们对雇主单位的忠诚度和对工作的满意度也会更高。菲尔德曼等人（Feldman et al. 2004）曾对美国98位子女为3-5个月大的双职工父母做过一次小型调查，并得出以下结论：对于那些在子女出生后很快重归工作岗位的家长来说，当他/她们对子女托幼质量的评价很高时，同时也认为自己的工作绩效很高。相反，在那些子女出生后长期中断工作的父母身上，未发现在托幼质量和工作绩效之间存在相关性。

梅尔斯（Meyers, 1993）得出的结论是，对子女所在托幼机构不满意的单身母亲和满意的母亲相比，更可能会在参加融入劳动力市场培训项目的一年之内放弃。其它可能导致其放弃培训的重要因素还有：父母生病时托幼机构的可靠性和灵活性较低，家长对托幼机构“安全”和“信任”两个质量维度的评价较低，托幼机构人员配置不符合官方的“NAEYC（全美幼教协会）认证标准”要求等。[17] 霍菲特和柯林斯（Hofferth & Collins, 2000）的研究是少数几个兼顾家长评价以外质量维度的研究项目之一，但他们并未在某地区的平均师幼比例与母亲退出职场的概率之间发现任何相关性。[18] 不过，如果该地区的托幼费用很高，那么低水平（潜在）工资的母亲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会降低。笔者推测，这一乍看起来违反直觉的结果体现出托幼质量的影响力：因为在美国，托幼机构的高质量是和家长缴纳的高费用相挂钩的，因此，当平均托幼费用和托幼质量都高的时候，家长更不太可能退出劳动力市场。

除了上述关注家长的职业特征和大多由家长自评的托幼质量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外，还有少数一些所谓的“干预”研究。其目的是：为随机选出的群体（“实验组”）提供高质量的托幼服务，然后将其与未获得这种“干预”、因此没有托幼机会或托幼质量很低的“对照组”进行对比。这些研究发现，优质托幼会产生因果影响，但是并不总能分清哪些是单纯由托幼服务的提供造成的影响，哪些是托幼质量导致的后果。

基斯科和西尔弗贝格（Kisker & Silverberg, 1991）更早时做过一项研究，他们对有幼年子女且接受救济的家长进行了抽样调查。他/她们接受救济的前提是参与就业或接受培训，并在寻找托幼机构时得到有关部门的帮助。和对照组相比，在实验组的136位主动参与者当中，较少有人声称自己在寻找托幼机构和承担托幼费用方面遇到过问题。相反，家长们更多遇到的是托幼机构的质量问题。后者常常成为他/她们结束或缩短工作和培训的一个理由。[19]

在美国的另一项调查中，布鲁克斯-甘等人（Brooks-Grunn et al. 1994）对特定儿童群组的985个家庭做了抽样调查。实验组得到了全方位的支持，比如定期家访、参加家长小组、孩子到了两岁能上优质托幼机构等。和对照组相比，实验组的母亲们会更早地重返职场，并更长期地工作。调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优

---

17 该标准是在幼儿教育和照料方面优质教育实践的准则。它由美国幼儿教育协会（NAEYC）公布，该机构是美国一家大型公益组织，同时也负责对优质托幼项目进行认证。

18 该发现与瑞格比等人（Rigby et al. 2007）的研究结果相矛盾，后者认为：在家长的就业率、美国联邦州关于师幼比例和保教人员进入托幼机构工作之前及期间接受培训的最低标准的严格程度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正相关。

19 尚不清楚的是，和对照组的母亲相比，实验组的母亲是否会在子女入托问题上做出妥协，从而选择质量更差的托幼机构；或是是否由于参加了这一项目及其包含的家长培训和咨询而认识到托幼质量的重要意义。

质的托幼服务项目能对家长就业产生积极影响。

“初学者项目”（Abecedarian-Project）还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该项目对111个社会弱势程度较高的家庭进行了抽样调查（Ramey et al. 2000）。实验组的儿童从出生到5岁期间接受了免费的全日制优质托幼服务。当这些孩子长到15岁时，干预措施对母亲的就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在没有得到如此高质量保育服务的对照组中，只有少数母亲去上班工作。

家长对兼顾职业家庭的满意度

其他一些研究则关注更优质的托幼服务能否改善家长对工作与家庭和谐兼顾的感受。有人对一家美国大型企业的约300名雇员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一方面无法为以下假设提供证明，即企业提供日托服务（on-site child care）可以减少员工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冲突（Goff et al. 1990）；而研究另一方面又证实了，员工的托幼满意度提高后，会减弱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冲突感，从而会显著降低员工的缺勤率。格林贝格和奥尼尔（Greenberger & O’Neil, 1990）在研究中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们认为，家长如果感到托幼机构的质量差，那么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冲突便会加剧，从而影响到父母中就业一方对自身角色的感受——但这只涉及已婚母亲。在一项针对多家美国联邦机构1675名雇员所做的大规模抽样调查中，爱德温斯等人（Erdwins et al. 1998）发现，在家长对子女所上托幼机构的总体满意度与他/她们对职业和家庭角色平衡的满意度之间存在明显的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这一结论同时适用于母亲和父亲——但是在爱德温斯等人此后的一项研究中（Erdwins et al. 2001），却无法证明这一关联。

布法尔迪和爱德温斯（Buffardi & Erdwins, 1997）还在研究中发现，当家长对某些（涉及教育专业人员特征的）质量维度的满意度提高后，他们的角色冲突感（即工作与家庭难以两全的问题）会弱化。另外两项类似的调查（Payne et al. 2012；Poms et al. 2009）在进行测量时又增加了其他质量维度。在对392名子女在上托幼机构的全日制工作母亲进行抽样分析时，珀姆斯等人（Poms et al. 2009）也获得了同样的发现：当家长对以教育专业人员特点为主的质量维度表示更加满意、同时也对托幼机构的总体情况感到满意时，家庭与工作互相冲突的问题便会减弱。佩恩等人（Payne et al. 2012）在其研究中发现，除了家长对特定教育质量特征的满意度之外，家长对托幼费用和托幼机构所在位置远近的满意度也会减少职业与家庭难以兼顾的问题。也就是说，托幼机构的优质、低价及其有利的地理位置会提升家长对工作与家庭和谐兼顾的满意度。此外，家长对托幼机构质量的满意度越高，也会使他/她们有1）更强的心理幸福感；2）更低的缺勤率；3）更不愿意跳槽——这一相关性的原因在于家长能够更好地兼顾家庭与职业。佩恩等人的研究（Payne et al. 2012）是基于对316位有学龄前子女的大学职工所做的抽样调查。

主观幸福感

在家长、尤其是母亲的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方面，主要测评的是他/她们的心理健康状态，而很少会涉及生理健康情况。而格林贝格和奥尼尔在美国所做的调查（Greenberger & O’Neil, 1990）结果显示，当已婚母亲和单亲母亲感到子女所在托幼机构的质量较差时，她们会出现更多的生理问题。此外研究者还发现，在单身母亲组中，如果对托幼机构的质量评价较差，那么和那些认为托幼机构优质的母亲相比，她们会产生更多的抑郁症状（参阅Goldberg et al. 1992）。法甘（Fagan 1994）对54位孩子只有几个月大的全日制工作母亲进行了小范围的抽样分析，结论是：如果孩子上的托幼机构离家或工作单位距离近，那么这些母亲会比那些工作单位离托幼机构很远的母亲更多地参与托幼机构的活动。

而更多地参与托幼机构的活动又会减轻母亲的抑郁症状。对111位孩子年龄在3-4岁的低收入黑人单身母亲的抽样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在母亲对托幼机构的满意度和母亲的抑郁症状之间存在关联：她们对托幼机构越不满意，就越容易出现抑郁症状——但她们的生活满意度与之并无关联（Jackson, 1997）。普莱斯等人（Press et al. 2006）对680名孩子不到13岁的母亲进行了调查，得出相同的结论，即当妇女因托幼费用或质量原因而要更换托幼机构，或称与托幼机构之间存在较大问题的时候，她们会表现出更强的抑郁症状。这一相关性在高收入行业的女性身上更为明显。

基于对129名在职已婚母亲所做的分析，爱德温斯等人（Erdwins et al. 2001）发现，母亲对托幼机构的满意度越高，她们的“分离恐惧感”（指母亲们担心长时间和自己的孩子分离）就越低。同样，布法尔迪和爱德温斯也在研究中（Buffardi & Erdwins, 1997）重点考察了家长对和保育人员沟通交流的满意度与母亲分离恐惧感之间的关联。

一个专题小组根据美国NICHD-SECCYD数据对1194名孩子年龄在0-3岁的母亲进行了问卷调查（Gordon et al. 2011）。结果显示，那些被母亲因为质量或对这种保育形式的偏好、而非出于实用原因所选择的托幼机构，也被独立观察员评价为质量更高。另外研究者还发现，

只需分析选择原因便可了解母亲的精神健康状态：如果一位母亲主要从质量而不是实用角度出发来选择一家托幼机构，那么她就不会太抑郁。相反，母亲的抑郁程度和由经过培训的观察员对托幼机构所作的质量评价之间没有相关性。

另外有少数研究指出，在托幼质量和其他维度之间——比如当孩子在学校里时家长的热心程度——也存在关联。一项基于NICHD-SECCYD数据的研究证实了托幼质量对家长参与程度的长期影响（Crosnoe et al. 2012）。孩子上优质托幼机构的时间越久，那么他/她们进入小学一年级以后，家长和小学教师之间沟通也会越紧密。这一关联有时也会体现在孩子的认知能力上，因为认知能力既和托幼质量之间、也和家长老师之间的沟通程度之间呈正相关性。此外，在高质量托幼机构中接受保育的时间越长，那么儿童家庭学习环境的激励质量（即互动关系及儿童家中的软、硬件设施）也就越高，而这又会促进家长和教师之间的沟通。分析均表明，在托幼质量和托幼形式这两个因果变量中，前者更为重要。

总结

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美国研究指出，在更优质的托幼服务和家长的就业、其他职业特征以及更好地兼顾工作和家庭之间存在正相关。此外，在优质的托幼服务和母亲的主观幸福感（通过测评她们的心理健康）之间，总体而言存在相关性。但是许多此类研究都基于小规模的抽样调查，而且往往只针对特定群体（比如单身父母或社会弱势群体）。此外，也并非总能用因果关系来解释相关性，尤其在托幼质量和主观幸福感之间。比如，情绪抑郁的母亲可能少有能力为自己的孩子找到好的托幼机构，或者她们对子女所上托幼机构的评价会低于那些不抑郁的母亲。因此，美国地区的相关成果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对已知的诸多关联在哪些方面产生影响进行分析。

5.2 德国国内的研究成果

上述研究成果均以美国数据为基础，而德国的情况却相反，因为据我们所知，类似可比性的分析在德国几乎没有做过，也就不存在相关的研究，依据微观数据来精确地考察托幼质量和其他涉及职业家庭兼顾的家长特征之间的关系。[20] 只有少数几项基于典型数据的研究，其中之一便是朔伯尔和施比斯（Schober & Spieß 2015）的研究，重点关注了就业和托幼质量之间的关系。她们根据社会经济调研项目（SOEP）和“德国家庭”（FiD）研究项目的数据进行分析，并且将这些数据与德国官方儿童和青少年事业统计数据中的托幼质量信息相结合，从而评测出被访者所在青少年管理局辖区的平均托幼质量水平。她们所调查和分析的是传统的结构质量特征，譬如班级规模和师幼比例。结果显示，在德国东部地区，对于0-3岁儿童母亲来说，该地区托幼机构班级平均人数越多，那么这些母亲去工作的概率以及她们的工作量就越低。而对于年龄更大儿童的母亲而言，尚无法观察到各个质量特征之间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明显关联。该项研究共抽样调查了3301位母亲。

在托幼规模方面，对上述数据源所做的另一项调查分析（2007-2012年）证实，在德国东部地区的全日制托幼名额增加之后，双亲家庭中的母亲对家庭生活和总体生活的满意度有所提高（Schober & Stahl 2016）。而在德国西部地区，双亲家庭中全职工作的母亲如果生活在全日制托幼名额非常少的地区，那么她们对自己家庭生活的不满意度要高于不工作的母亲。该结果是基于对2612名双亲家庭母亲和591名单身母亲的调查。

20 这并不排除有许多其他研究把相应关联作为研究的子课题、而非研究重点。

六

结论

德国《儿童和青少年专业工作法》规定，托幼机构的任务是促进儿童的成长。这是它们的核心任务，托幼机构的教育工作属于德国教育体制的基础阶段。从家庭政策角度来看，托幼机构的工作目标是为儿童的成长提供支持。因此，所有儿童都应该有机会进入托幼机构，并且都能获得优质教育——这正是本文研究和探讨的内容。

托幼机构的另一项核心任务是支持家庭教育，并让家长更容易实现家庭与职业的兼顾。因此从家庭政策角度来看，托幼机构的工作目标同样也是帮助家长更好地实现家庭和职业的和谐兼顾。对于这一点，人们往往单从数量角度来看待，然而质量方面的考虑其实也非常重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依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上述两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本文只着眼于采用定量实证方法的研究项目成果，亦即采用微观数据和定量方法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由于目前德国的相关研究成果——尤其对于第二方面的问题——相当有限，因此本文主要探讨了国外的研究项目，在此总结的研究成果大多以美国数据为基础。研究结果对德国的借鉴意义相当有限，但却为德国可能存在的关联给出了一些提示。

有鉴于此，下面将首先对德国的现状做一个简短的总结，然后再针对家庭和教育政策以及未来的研究工作提出一些行动建议。

总体而言，我们可以认为：在德国，除了托幼机构质量存在很大的区域差异之外——而这其实是不同的框架条件所造成的，在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方面也存在差异。在来自社会经济弱势家庭的儿童中，有一部分会上教育质量较差的托幼机构。这一结论来自于德国最新的研究成果——至少从某些特定的质量维度来看。

比如，有移民背景的儿童所上托幼机构的质量相对较低。对于某些特定的质量特征而言，也有证据显示，来自教育程度较低家庭的儿童，他们所上托幼机构的这些质量特征相对来说更差。对此，相关研究还无法甄别这一效果是由入托筛选造成的，还是由区域空间隔离造成的。[21] 前者是指当某一地区有很多不同质量的托幼机构时，特定群体的儿童更有可能进入质量相对较差的托幼机构；后者是指当特定群体生活在没有优质托幼机构存在的地区。导致上述情况出现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越来越多来自社会弱势群体家庭或有移民背景的儿童进入托幼机构，增加了这些机构教育工作的难度，从而使它们的教育质量受到负面影响。不过，原则上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特定居民区的托幼机构获得更多的政府资助，从而提高了托幼质量。如果是这样，那么就不会观察到相应的区域隔离效果了。[22]

不管是入托筛选，还是区域空间隔离产生的效果，有关研究都发现：在德国，有移民背景的儿童所上托幼机构的质量相比而言会更差一些。

为了制订相应的行动建议，关键是找出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社会经济质量的差异（请见下文）。不过针对这些差异的原因及其产生过程，目前只有少量经过系统论证的实证证据。

而在本研究聚焦的另一个方面，即托幼质量和它

---

21 本文作者在此感谢伊翁•安德斯（Yvonne Anders）明确指出这一不同之处。

22 这一情形可以在英国观察到。英国政府为落后地区提供专项拨款，因此，这些地区的部分儿童反而能比未受资助地区的儿童进入更优质（至少从某些质量特征来看）的托幼机构（请见第四章）。

对家长“影响”之间的关联，相关结论基本上是以美国研究为基础而获得的：托幼机构的质量会影响到母亲的工作和就业。比如当母亲的收入很不稳定时，托幼质量会让其更容易做出上班工作的决定。托幼质量和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联十分重要，它可以提高家长的劳动生产率。此外，如果家长对子女所上托幼机构的质量感到满意或者评价较高，那么他/她们对家庭和工作和谐兼顾的满意度也会提高。也有证据显示，家长的幸福感——通过测量他们的心理健康程度——和托幼机构的质量也有关联。不过，我们在分析这些研究成果时必须十分谨慎，不能将其解释为真实存在的影响关系。

实证研究（包括基于德国数据所做的实证研究）还证明，家长对托幼机构质量的主观评价不同于经过培训的观察员所做的评价，也不同于托幼机构专业人员自身的评价。这可能是家长们总体上对子女所在托幼机构表示满意的原因之一——尽管有其他研究证明，德国的托幼质量最多只达到中等水平。此外研究还发现，家长对不同质量维度的重视程度不一样，而且给出的评价也是不同的。那么在广泛意义上，我们可以从这些发现中获得哪些研究需求和行动建议呢？

6.1 进一步的研究需求

从国外的研究成果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是托幼质量和社会经济特征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托幼质量和它对家长“影响”之间的关联，都存在巨大的研究潜力。越来越多的研究探讨了家长的社会经济特征与托幼机构特定的质量特征之间的关联。有一些美国研究对托幼质量如何影响与家长职业家庭兼顾相关的特征进行了分析，但是这些分析大多是关于相关性的研究，而相关性并不总是能被解释为实际存在的影响链。在这一点上，国外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对德国的相关研究工作来说，随着新数据的不断产生，针对上述关联和影响还可展开更为深入研究，比如针对德国国家教育调查研究（NEPS）、BiKS数据和K²ID-SOEP（德国儿童托幼）附加研究项目，这些微观数据包含了大量关于托幼机构质量以及家庭和儿童的详细资料。在未来，德国还存在很大的研究需求，尤其在托幼质量与家长就业特征及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联方面。比如，应采用实证方法、系统地研究家长是否会因顾虑到托幼质量而推迟就业的起始时间或者调整自己的工作量。此外，对于哪些质量维度对家长的劳动生产率特别重要的问题，德国还缺乏系统性实证研究的成果。

6.2 针对家庭和教育政策的行动建议

针对家庭和教育政策，我们可以推导出以下行动建议，这些建议的意义和行动设计则应在进一步研究中不断完善。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就托幼机构质量与家庭职业兼顾之间的关系及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而言，还需以德国数据为基础开展进一步研究（请见6.1.）。

已有的措施需要深化、新的措施有待开发，目的是让孩子们无论来自怎样的社会经济背景，都能进入优质的托幼机构。必须以缩小差异为目标，以尽早减少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现象，并充分利用所有的教育潜力。在实施现有的提高托幼机构质量的计划和项目时，应考虑在各个不同的层面、结合各不同的参与方（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进行。[23] 不过，除了单个的、因而有限的阶段性资助项目之外，若以托幼质量的可持续改善为追求目标，则需进行更加全面的、更为根本的变革（请见下文）。

目前，德国家庭政策的一项明确目标便是实现家庭与工作的和谐兼顾，为此——这可从国外的研究成果中得到证明——还必须让德国所有地区的儿童和家庭都能获得优质的托幼服务。相应地，各级政府必须加大投入，制订措施，除了关心儿童福祉之外，还要考虑到家长的幸福感。

具体而言，以下措施可以有助于上述目标的实现。其中的一些建议在本世纪初或更早之前便已被广为探讨。然而，随着托幼机构数量的激增、以及它们对家庭重要性的上升，这些建议显得更具现实性和迫切性。此外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还存在另一种因果关系：我们不仅要在儿童成长的大背景下探讨托幼质量，而且还要从不平等角度、结合职业家庭兼顾问题对此加以分析和研究。

丰富家长知识，增强家长意识

— 应当通过制度化的措施，使家长能够更容易地评价托幼机构的质量。此类措施必须面向所有家长，而不是首先使那些拥有良好教育背景、本来就可能获取更多信息的家长受惠，从而导致更大的教育不平等现象的出现。因此，必须运用低门槛、透明化的措施，让所有家长都能对教育质量进行

23 比如：联邦政府的《托幼机构+》（KITAPLUS）计划、《语言托幼机构：因为语言是打开世界的钥匙》计划、联邦政府的《重点托幼机构语言与融合》计划、联邦和州合作开展的“用语言和文字进行教育”（BISS）计划、或者联邦政府的《在实践中学习》计划。

评价。这方面可以考虑采用透明化的托幼机构质量标志或类似工具（参阅Spieß & Tietze，2002）。所有的家长都应无需太多交易成本——即花费太多时间或需要深入了解——便能对托幼机构的质量做出评价。

— 所有家长都应意识到优质教育以及选择适当的托幼机构对子女和自己的重要意义。他们可以从身边那些在幼儿早期阶段便会接触到的参与方（比如儿科诊所、家庭咨询机构）处获得这些信息。其中，家长也应更多地认识到，哪些特定的托幼质量特征对儿童的认知和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尤为重要，并有助于为儿童进入德国教育培养体系接受教育做好准备。

保证质量：统一的最低标准和定期评估

— 很久以来，德国国内一直在讨论建立全国统一的托幼最低质量标准，从而确保有一套能为德国所有家庭所用、并适用于所有地区的优质教育最低标准。如今，教育行业已有足够的实证证据说明一个优质的托幼机构应当满足的最低标准有哪些。此外，制订统一的国家质量标准可以向全国公众发出信号，展示优质托幼对所有儿童和家长的重要意义。希望借此可以缩小各托幼机构之间的质量差异，从而减少——即使无法避免——儿童早期教育领域存在的不平等现象。

— 托幼质量的提高有赖于所有参与方的财政支持：地方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24] 其中，联邦政府应当提高其在总投资额中所占的比例，因为优质托幼对家庭和工作的和谐兼顾意义重大，而这正是联邦政府明确提出的目标。这些措施能使全社会受益，因此联邦政府应加大相关财政扶持力度，从而确保托幼质量持续稳定的提高。从短期至中期来看，让更多的母亲参加工作，将会提高联邦的财政收入，比如通过个人所得税（参阅Spieß, 2010）。不过，应确保这些联邦资金真正用到了提高托幼质量的用途上——比如，取消育儿津贴后，这部分预算资金应划拨给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由于从宪法角度考虑，并非所有的联邦专项资金都可用于托幼事业，因此需要开动脑筋，充分利用各种可能的资助手段（参阅Spieß 2010 和Spieß 2012）。也就是说，联邦不能直接参与托幼机构运营费用的融资。

— 各联邦州均应对所有托幼机构的教育质量开展强制性的定期评估，因为评估是质量保证体系的核心内容（参阅Tietze 1998）。一次成功的评估可能为托幼机构带来更多的资金，而一定比例的政府资金也可以与特定的最低质量标准和/或定期评估的结果相挂钩。

— 定期质量评估需要以过程质量为导向，其实这已是实践中的常态。此外，评估时还应更多考虑质量的家庭关联度，其中家长的看法非常关键。然而在目前所采用的多种质量评价方法中，家长的看法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需审视是否应当补充进去，尤其是考虑到所有儿童均应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以及特定质量特征对家长的影响。

对需要更多资源或提供更好服务的托幼机构提供定向资助

— 根据一些州和地方政府的惯常做法（参阅Hogrebe 2014），有必要定向资助那些因周边环境或儿童构成（例如非以德语为母语的儿童比例很高）可能面临托幼条件较差的机构，向其拨付更多的扶持资金。

— 从正面激励的角度来看，也可特别资助那些关注家庭、以及家庭的学习环境和家长幸福感——除儿童幸福感之外——的托幼机构。一方面，教育专业人员和家长需要更频繁地开展信息交流，共同商讨托幼机构和家庭中举办的活动以及儿童成长的问题，从而加强双方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尤其考虑到家庭和工作的和谐兼顾，在关注儿童成长的同时，还应推动非教育质量特征的改善。

---

24 在过去几年中，联邦政府一直在投入资金，用于增加托幼机构的数量和提高托幼质量，而且今后还将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已投入十亿欧元用于扩建托幼机构，而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将分别从2017和2018年起，每年额外拨付1亿欧元用于支持托幼机构的运营。

图表目录

参考文献

Alt, C., Hubert, S., & Berngruber, A. (2013). Betreuungsangebote und -bedarf aus Elternsicht: Passgenauigkeit und Zufriedenheit. München.

Anders, Y. (2013). Keyword: Effects of centre-based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programmes. Zeitschrift für Erziehungswissenschaft, 16(2), 237–275. doi:10.1007/s11618-013-0357-5

Anderson, L. M., Shinn, C., Fullilove, M. D., Scrimshaw, S. C., Fielding, J. E., Normand, J., & Carande-Kulis, V. G. (2003). The effectiveness of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programs. A systematic review.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4(3), 32–46.

Araujo, M. C., Carneiro, P., Cruz-Aguayo, Y., & Schady, N. (2016). Teacher Quality and Learning Outcomes in Kindergarte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1(3), 1415–1453. doi:10.1093/qje/qjw016

Baker, M., Gruber, J., & Milligan, K. (2008). Universal childcare, maternal labor supply, and family well-be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6(4), 709–745.

Barraclough, S. J., & Smith, A. B. (1996). Do parents choose and value quality child care in New Zeal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rly Years Education, 4(1), 5–26. doi:10.1080/0966976960040101

Barros, S., & Leal, T. B. (2015). Parents' and teachers' perceptions of quality in Portuguese childcare classrooms.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30(2), 209–226. doi:10.1007/s10212-014-0235-4

Becker, B. (2010a). Wer profitiert mehr vom Kindergarten?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62(1), 139–163. doi:10.1007/s11577-010-0090-5

Becker, B. (2010b). Ethnische Unterschiede bei der Kindergartenselektion: Die Wahl von unterschiedlich stark segregierten Kindergärten in deutschen und türkischen Familien. In B. Becker & D. Reimer (Hrsg.), Vom Kindergarten bis zur Hochschule. Die Generierung von ethnischen und sozialen Disparitäten in der Bildungsbiographie. 17–47. Wiesbaden.

Becker, B., & Schober, P. S. (2015). Not just any child care center? Social and ethnic disparaties in the choice of early education institutions with a beneficial learning environment. Manuscript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Beckh, K., Mayer, D., Berkic, J., & Becker-Stoll, F. (2014). Der Einfluss der Einrichtungsqualität auf die sprachliche und sozial-emotionale Entwicklung von Kindern mit und ohne Migrationshintergrund. Frühe Bildung, 3(2), 73–81. doi:10.1026/2191-9186/a000150

Berger, E. M., & Spieß, C. K. (2011). Maternal Life Satisfaction and Child Outcomes: Are They Related?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32(1), 142–158. doi:10.1016/j.joep.2010.10.001

Bertelsmann Stiftung. (2016). Ländermonitoring Frühkindliche Bildungssysteme. www.laendermonitor.de/uebersicht-grafiken/index.nc.html (aufgerufen am 30.8.2016).

Biedinger, N., Becker, B., & Rohling, I. (2008). Early Ethnic Educational Inequality: The Influence of Duration of Preschool Attendance and Social Composition.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4(2), 243–256. doi:10.1093/esr/jcn001

BMFSFJ – Bundesministerium für Familie, Senioren, Frauen und Jugend (2014). Vierter Zwischenbericht zur Evaluation des Kinderförderungsgesetzes. Berlin.

BMFSFJ – Bundesministerium für Familie, Senioren, Frauen und Jugend (2015). Fünfter Bericht zur Evaluation des Kinderförderungsgesetzes. Berlin.

Bock-Famulla, K., Lange, J., & Strunz, E. (2015). Länderreport Frühkindliche Bildungssysteme 2015. Gütersloh.

Bolger, K. E., & Scarr, S. (1995). Not So Far From Home: How Family Characteristics Predict Child Care Quality. Early Development and Parenting, 4(3), 103–112.

Britner, P. A., & Phillips, D. A. (1995). Predictors of Parent and Provider Satisfaction with Qiild Day Care Dimensions: A Comparison of Center-Based and Family Child Day Care. Child Welfare: Journal of Policy, Practice, and Program, 74(6), 1135–1168. doi:10.1017/CBO9781107415324.004

Brodeur, A., & Connolly, M. (2013). Do higher child care subsidies improve parental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Quebec's family policie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93, 1–16. doi:http://dx.doi.org/10.1016/j.jebo.2013.07.001

Brooks-Gunn, J., McCormick, M. C., Shapiro, S., Benasich, A., & Black, G. W. (1994). The effects of early education intervention on maternal employment, public assistance, and health insurance: the infant healt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84(6), 924–931. doi:10.2105/AJPH.84.6.924

Brooks-Gunn, J., Han, W.-J., & Waldfogel, J. (2010). First-Year Maternal Employment and Child Development in the First Seven Years. Monographs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75(2), 7–9. doi:10.1111/j.1540-5834.2010.00562.x

Buffardi, L. C., & Erdwins, C. J. (1997). Child-care satisfaction: linkages to work attitudes, interrole conflict, and maternal separation anxiety.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2(1), 84–96. doi:10.1037/1076-8998.2.1.84

Burger, K. (2010). How does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affect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effects of early intervention for children from different social backgrounds.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25(2), 140–165.

Camehl, Georg F., Pia S. Schober, and C. Katharina Spiess (2015a). A SOEP-Related Study: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Quality in the Socio-Economic Panel (K2ID-SOEP), in SOEP Wave Report 2014, herausgegeben von Sandra Gerstorf und Jürgen Schupp. Berlin: DIW Berlin / SOEP, 31-34.

Camehl, G. F., Stahl, J. F., Schober, P. S., & Spieß, C. K. (2015b). Höhere Qualität und geringere Kosten von Kindertageseinrichtungen – zufriedenere Eltern? DIW Wochenbericht, 82(46), 1105–1113.

Camehl, G. F., Schober, P. S., & Spieß, C. K. (2016).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Between Parents and Educators in German Day Care Institutions (Manuskript zur Veröffentlichung eingereicht).

Camilli, G., Vargas, S., Ryan, S., & Barnett, W. S. (2010). Meta-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Early Education Interventions on Cognitiv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112(3), 579–620.

Chaudry, A., Henly, J., & Meyers, M. (2010). Conceptual Frameworks for Child Care Decision-Making. Washington DC.

Crosnoe, R., Augustine, J. M., & Huston, A. C. (2012). Children's Early Child Care and their Mothers' Later Involvement with Schools. Child development, 83(2), 758–772. doi:10.1111/j.1467-8624.2011.01726.x

Cryer, D., & Burchinal, M. (1997). Parents as child care consumers.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12(1), 35–58. doi:10.1016/S0885-2006(97)90042-9

Cryer, D., Tietze, W., Burchinal, M., Leal, T., & Palacios, J. (1999). Predicting process quality from structural quality in preschool programs: a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14(3), 339–361. doi:10.1016/S0885-2006(99)00017-4

Cryer, D., Tietze, W., & Wessels, H. (2002). Parents ' perceptions of their children ' s child care: 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17(2), 259–277.

Diskowski, D. (2007). Männer in die Kita. Eine tätigkeitsbegleitende Qualifizierung arbeitsloser Männer zu Fachkräften. KiTa aktuell MO, 208–210.

Dowsett, C., & Huston, A. (2008). Structural and process features in three types of child care for children from high and low income families.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23(1), 69–93. doi:10.1016/j.ecresq.2007.06.003

Erdwins, C. J., Casper, W. J., & Buffardi, L. C. (1998). Child Care Satisfaction: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Gender and Type of Child Care Used. Child & Youth Care Forum, 27(2), 111–123.

Erdwins, C. J., Buffardi, L. C., Casper, W. J., & O'Brien, A. S. (2001). The Relationship of Women' s Role Strain to Social Support , Role Satisfaction , and Self-Efficacy. Family Relations, 50(3), 230–238.

Fagan, J. (1994). Factors related to depression among higher income mothers with young children in day care centers.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99(1), 79–92. doi:10.1080/0300443940990107

Feldman, R., Sussman, A. L., & Zigler, E. (2004). Parental leave and work adaptation at the transition to parenthood: Individual, marital, and social correlates.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5(4), 459–479. doi:10.1016/j.appdev.2004.06.004

Fuchs-Rechlin, K., Kaufhold, G., Thuilot, M., & Webs, T. (2014). Der U3-Ausbau im Endspurt. Analysen zu kommunalen Betreuungsbedarfen und Betreuungswünschen von Eltern. Dortmund.

Gambaro, L., Stewart, K., & Waldfogel, J. (2015). A question of quality: do children from disadvantaged backgrounds receive lower quality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41(4), 553–574. doi:10.1002/berj.3161

Gilliam, W. S., & Zigler, E. F. (2000). A critical meta-analysis of all evaluations of state-funded preschool from 1977 to 1998: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service delivery and program evaluation.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15(4), 441–473. doi:10.1016/S0885-2006(01)00073-4

Goff, S. J., Mount, M. K., & Jamison, R. L. (1990). Employer Supported Child Care,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Absenteeism: A Field Study. Personnel Psychology, 43(4), 793–809. doi: 10.1111/j.1744-6570.1990.tb00683.x

Goldberg, W. A., Greenberger, E., Koch-Jones, J., O'Neil, R., & Hamill, S. (1989). Attractiveness of child care and related employer-supported benefits and policies to married and single parents. Child & Youth Care Quarterly, 18(1), 23–37. doi:10.1007/BF01086798

Goldberg, W. A., Greenberger, E., Hamill, S., & O'Neil, R. (1992). Role Demands in the Lives of Employed Single Mothers With Preschooler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3(3), 312–333. doi:10.1177/019251392013003004

Goodman, S. H. (2007). Depression in Mothers.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3, 107–135. doi: 10.1146/annurev.clinpsy.3.022806.091401

Gordon, R. A., Usdansky, M. L., Wang, X., & Gluzman, A. (2011). Child Care and Mothers' Mental Health: Is High-Quality Care Associated With Fewer Depressive Symptoms? Family Relations, 60(4), 446–460. doi:10.1111/j.1741-3729.2011.00657.x

Gorey, K. M. (2001).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 meta-analytic affirmation of the short- and long-term benefits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School Psychology Quarterly, 16(1), 9–30. doi:10.1521/scpq.16.1.9.19163

Grammatikopoulos, V., Gregoriadis, A., Tsigilis, N., & Zachopoulou, E. (2014). Parental conceptions of quality in Greek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Europea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Research Journal, 22(1), 134–148. doi:10.1080/1350293X.2012.738868

Greenberger, E., & O'Neil, R. (1990). Parents'concerns about their child's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for fathers' and mothers' well being and attitudes toward work.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2(3), 621–635.

Han, W.-J., Waldfogel, J., & Brooks-Gunn, J. (2001). The Effects of Early Maternal Employment on Later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Outcom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3(2), 336–354.

Hayes, C. D., Palmer, J. L., & Zaslow, M. L. (1990). Who cares for America's children? Child care policy for the 1990s. Washington DC.

Hofferth, S., & Collins, N. (2000). Child care and employment turnover.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19(4), 357–395. doi:10.1023/A:1026575709022

Hogrebe, N. (2014). Bedarfsorientierte Finanzierung von Kindertageseinrichtungen. In Bildungsfinanzierung und Bildungsgerechtigkeit. Der Sozialraum als Indikator für eine bedarfsgerechte Finanzierung von Kindertageseinrichtungen? 165–188. Wiesbaden. doi:10.1007/978-3-658-03489-4

Howe, N., Jacobs, E., Vukelich, G., & Recchia, H. (2013). Canadian parents' knowledge and satisfaction regarding their child's day-care experience. Journal of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11(2), 133–148. doi:10.1177/1476718X12466214

Jackson, A. P. (1997). Effects of concerns about child care among single, employed Black mothers with preschool children.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5(5), 657–673. doi:10.1023/A:1024686901147

Johansen, A. S., Leibowitz, A., & Waite, L. J. (1996). The Importance of Child-Care Characteristics to Choice of Car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58(3), 759–772. doi:10.2307/353734

Justice, L. M., Petscher, Y., Schatschneider, C., & Mashburn, A. (2011). Peer effects in preschool classrooms: is children's language growth associated with their classmates' skills? Child development, 82(6), 1768–77. doi:10.1111/j.1467-8624.2011.01665.x

Karoly, L. A., Ghosh-Dastidar, B., Zellman, G. L., Perlman, M., & Fernyhough, L. (2008). Prepared to Learn: The Nature and Quality of Early Care and Education for Preschool-Age Children in California.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Karoly, L. A., & Gonzalez, G. C. (2011). Early Care and Education for Children in Immigrant Families. Future of Children, 21(1), 71–101.

Kärrby, G., & Giota, J. (1995). Parental conceptions of quality in daycare centers in relation to quality measured by the ECERS.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110(1), 1–18. doi:10.1080/0300443951100101

Kensinger Rose, K., & Elicker, J. (2008). Parental Decision Making About Child Care.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9(9), 1161–1184. doi:10.1177/0192513X07312103

Kisker, E. E., & Silverberg, M. (1991). Child Care Utilization by Disadvantaged Teenage Mother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7(2), 159–177. doi:10.1111/j.1540-4560.1991.tb00293.x

Klein, O., Biedinger, N., & Kolb, J.-P. (2016). Ethnische Unterschiede bei der Kindergartenwahl (Manuskript zur Veröffentlichung eingereicht).

Klinkhammer, N. (2008). Flexible und erweiterte Kinderbetreuung in Deutschland. Ergebnisse einer Recherche in ausgewählten Bundesländern. München.

Kluczniok, K., & Roßbach, H.-G. (2014). Conceptions of educational quality for kindergartens. Zeitschrift für Erziehungswissenschaft, 17(6), 145–158. doi:10.1007/s11618-014-0578-2

Kroell, A., & Borck, R. (2013). The Influence of Child Care on Maternal Health and Mother-Child Interaction.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2286062.

Kuger, S., & Kluczniok, K. (2008). Prozessqualität im Kindergarten—Konzept, Umsetzung und Befunde. Zeitschrift für Erziehungswissenschaft, Sonderheft, 11, 159–178.

Kuger, S., Kluczniok, K., Kaplan, D., & Rossbach, H.-G. (2016). Stability and patterns of classroom quality in Germa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School Effectiveness and School Improvement, 27(3), 418–440. doi:10.1080/09243453.2015.1112815

Leach, P., Barnes, J., Nichols, M., Goldin, J., Stein, A., Sylva, K., & Malmberg, L.-E. (2006). Child care before 6 months of age: a qualitative study of mothers' decisions and feelings about employment and non-maternal care. Infant and Child Development, 15(5), 471–502. doi:10.1002/icd.473

Ledig, M., Schneider, K., & Zehnbauer, A. (1996). »Orte für Kinder«: Pluralisierung von Betreuungsformen - Öffnung von Institutionen. Zeitschrift für Pädagogik, 42(3), 347–364.

Lehrer, J. S., Lemay, L., & Bigras, N. (2015). Parental Perceptions of Child Care Quality in Centre-Based and Home-Based Settings : Associations with External Quality Rating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rly Childhood, 47(3), 481–497. doi:10.1007/s13158-015-0147-8

Lehrl, S., Kuger, S., & Anders, Y. (2014). Soziale Disparitäten beim Zugang zu Kindergartenqualität und differenzielle Konsequenzen für die vorschulische mathematische Entwicklung. Unterrichtswissenschaft, 42(2), 132–151.

Lovejoy, M. C., Graczyk, P. A., O'Hare, E., & Neuman, G. (2000). Maternal depression and parenting behavior: A meta-analytic review.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0(5), 561–592. doi:10.1016/S0272-7358(98)00100-7

Mason, K. O., & Kuhlthau, K. (1992). The perceived impact of child care costs on women's labor supply and fertility. Demography, 29(4), 523–543. doi:10.2307/2061850

Mathers, S., Sylva, K., & Joshi, H. (2007). Quality of Childcare Settings in the Millennium Cohort Study. DfES research Report SSU/2007/FR/025.

McCartney, K., Dearing, E., Taylor, B. A., & Bub, K. L. (2007). Quality child care supports the achievement of low-income children: Direct and indirect pathways through caregiving and the home environment.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8(5-6), 411–426. doi:10.1016/j.appdev.2007.06.010

Meyers, M. K. (1993). Child Care in JOBS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Program: What Difference Does Quality Mak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55(3), 767–783. doi:10.2307/353356

Meyers, M. K., & Jordan, L. P. (2006). Choice and accommodation in parental child care decisions. Community Development, 37(2), 53–70.

Miller, C. (2006).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Childcare and 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Institute Economic Review, 195(1), 118–132. doi:10.1177/0027950106064042

Mocan, N. (2007). Can Consumers Detect Lem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in the Market for Child Care.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4), 743–780. doi:10.1007/sOO

Müller, K. U., Spieß, C. K., Tsiasioti, C., Wrohlich, K., Bügelmayer, E., Haywood, L., Peter, F., Ringmann, M., & Witzke, S. (2013). Förderung und Wohlergehen von Kindern. politikberatung kompakt 73. Berlin.

NICHD Early Child Care Research Network (1997). Famili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nmaternal Care for Infant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59(2), 389–408.

NICHD Early Child Care Research Network (2002). Early child care and children's development prior to school entry: Results from the NICHD Study of Early Child Car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39(1), 133–164.

Ofsted – The 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 Children's Services and Skills (2012). The report of Her Majesty's Chief Inspector of Education, Childrens Services and Skills: Early years. London.

Payne, S. C., Cook, A. L., & Diaz, I. (2012). Understanding childcare satisfaction and its effect on workplace outcomes: The convenience factor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work-family conflict.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85(2), 225–244. doi:10.1111/j.2044-8325.2011.02026.x

Peyton, V., Jacobs, A., O'Brien, M., & Roy, C. (2001). Reasons for choosing child care: associations with family factors, quality, and satisfaction.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16(2), 191–208. doi:10.1016/S0885-2006(01)00098-9

Phillips, D. A., Voran, M., Kisker, E., Howes, C., & Whitebook, M. (1994). Child Care for Children in Poverty: Opportunity or Inequity? Child development, 65(2), 472–492.

Phillipsen, L. C., Burchinal, M. R., Howes, C., & Cryer, D. (1997). The prediction of process quality from structural features of child care.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12(3), 281–303. doi:10.1016/S0885-2006(97)90004-1

Pianta, R. C., La Paro, K. M., Payne, C., Cox, M. J., & Bradley, R. (2002). The relation of kindergarten classroom environment to teacher, family, and school characteristics and child outcomes. The Elementary School Journal, 102(3), 225–238.

Poms, L. W., Botsford, W. E., Kaplan, S. a, Buffardi, L. C., & O'Brien, A. S. (2009). The economic impact of work and family issues: child care satisfaction and financial considerations of employed mothers.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14(4), 402–13. doi:10.1037/a0017143

Press, J., Fagan, J., & Bernd, E. (2006). Child Care, Work,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Low-Income Mother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7(5), 609–632.

Pungello, E. P., & Kurtz-Costes, B. (1999). Why and How Working Women Choose Child Care: A Review with a Focus on Infancy. Developmental Review, 19(1), 31–96. doi:10.1006/drev.1998.0468

Ramey, C. T., Campbell, F. A., Burchinal, M., Skinner, M. L., Gardner, D. M., & Ramey, S. L. (2000). Persistent Effects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on High-Risk Children and Their Mothers. Applied Developmental Science, 4(1), 2–14. doi:10.1207/S1532480XADS0401_1

Reid, J. L., Kagan, S. L., Hilton, M., & Potter, H. (2015). A better start. Why classroom diversity matters in early education. New York.

Rentzou, K., & Sakellariou, M. (2013). Researcher's and parents' perspectives on quality of care and education.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183(2), 294–307. doi:10.1080/03004430.2012.673486

Rigby, E., Ryan, R. M., & Brooks-Gunn, J. (2007). Child care quality in different state policy contexts.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26(4), 887–908. doi:10.1002/pam.20290

Ross, C., & Paulsell, D. (1998). Sustaining Employment among Low-Income Parents: The Role of Quality in Child Care: A Reserach Review. Final Report. Princeton.

Ruhm, C. R., & Waldfogel, J. (2012). Long-Term Effects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Nordic Economic Policy Review, 1, 23–51.

Schober, P. S., & Schmitt, C. (2013). Ausbau der Kinderbetreuung: Entlastung der Eltern erhöht Zufriedenheit. DIW Wochenbericht, 80(50), 3–12.

Schober, P. S., & Spieß, C. K. (2013).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ctivities and Care Arrangements of Disadvantaged Children in Germany. Child Indicators Research, 6(4), 709–735. doi:10.1007/s12187-013-9191-9

Schober, P. S., & Stahl, J. F. (2014). Childcare trends in Germany-Increasing socioeconomic disparaties in East and West. DIW Economic Bulletin, 4(11), 51–58.

Schober, P. S., & Spieß, C. K. (2015). Local Day Care Quality and Maternal 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East and West German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7(3), 712–729.

Schober, P. S., & Stahl, J. F. (2016). Expansion of Full-Day Childcar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Mothers: Interdependencies with Culture and Resource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32), 593-606.

Schober, P. S., & Schmitt, C. (im Ersch.). Day-care availability, maternal employment, and satisfaction of parents: Evidence from cultural and policy variations in Germany.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Schröder, C., Spieß, C. K., & Storck, J. (2015). Private Bildungsausgaben für Kinder: Einkommensschwache Familien sind relativ stärker belastet. DIW Wochenbericht, 82(8), 158–169.

Scopelliti, M., & Musatti, T. (2013). Parents' View of Child Care Quality: Values, Evaluations, and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2(8), 1025–1038. doi:10.1007/s10826-012-9664-3

Shlay, A. B., Tran, H., Weinraub, M., & Harmon, M. (2005). Teasing apart the child care conundrum: A factorial survey analysis of perceptions of child care quality, fair market price and willingness to pay by low-income, African American parents.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20(4), 393–416. doi:10.1016/j.ecresq.2005.10.002

Spieß, C. K. (2010). Sieben Ansatzpunkte für ein effizienteres System der frühkindlichen Bildung in Deutschland. In T. Apolte & U. Vollmer (Hrsg.), Bildungsökonomik und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Stuttgart.
Spieß, C. K. (2012). Eine ökonomische Perspektive auf das deutsche System der frühkindlichen Bildung.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62(22-24), 20–26.

Spieß, C. K., & Tietze, W. (2002). Qualitätssicherung in Kindertageseinrichtungen. Zeitschrift für Erziehungswissenschaft, 5(1), 139–162. doi:10.1007/s11618-002-0008-8

Stahl, J. F., Schober, P. S., & Spieß, C. K. (2016). Parental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hildcare quality choices: Early inequalities in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Unveröffentlichtes Manuskript.

Tietze, W. (1998). Wie gut sind unsere Kindergärten? Eine Untersuchung zur pädagogischen Qualität in deutschen Kindergärten. Berlin.

Tietze, W., & Cryer, D. (2004). Comparisons of observed process quality in German and American infant/toddler progra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rly Years Education, 12(1), 43–62. doi:10.1080/0966976042000182370

Tietze, W., Schuster, K.-M., Grenner, K., & Roßbach, H.-G. (2007). Kindergarten-Skala (KES-R). Feststellung und Unterstützung pädagogischer Qualität in Kindergärten. Deutsche Fassung der Early childhood environment rating scale – revised edition von Thelma Harms, Richard M. Clifford, Deborah Reid Cryer. Rev. Fassung, 3., überarb. Aufl. Einheitssachtitel: Early childhood environment rating scale – ECERS-S (dt.). Berlin.

Tietze, W., Becker-Stoll, F., Bensel, J., Haug-Schnabel, G., Kalicki, B., Keller, H., & Leyendecker, B. (2013). NUBBEK. Nationale Untersuchung zur Bildung, Betreuung und Erziehung in der frühen Kindheit. Weimar.

Torquati, J. C., Raikes, H. H., Huddleston-Casas, C. A., Bovaird, J. A., & Harris, B. A. (2011). Family income, parent education, and perceived constraints as predictors of observed program quality and parent rated program quality.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26(4), 453–464. doi:10.1016/j.ecresq.2011.03.004

Usdansky, M. L., & Wolf, D. A. (2008). When Child Care Breaks Down: Mothers' Experiences With Child Care Problems and Resulting Missed Work.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9(9), 1185–1210. doi:10.1177/0192513X08317045

Vandell, D. L., & Wolfe, B. (2000). Child care quality: Does it matter and does it need to be improved? Madison.

Vandenbroeck, M., De Visscher, S., Van Nuffel, K., & Ferla, J. (2008). Mothers' search for infant child care: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availability and desirability in a continental European welfare state.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23(2), 245–258. doi:10.1016/j.ecresq.2007.09.002

Viernickel, S., Fuchs-Rechlin, K., Strehmel, P., Preissing, C., Bensel, J., & Haug-Schnabel, G. (2015). Qualität für alle: Wissenschaftlich begründete Standards für die Kindertagesbetreuung. Freiburg.

Waldfogel, J. (2015). The role of preschool in reducing inequality. Preschool improves child outcomes especially for disadvantages children. IZA World of Labor, 219.

Yamauchi, C. (2010). The availability of child care centers, perceived search costs and parental life satisfac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8(2), 231–253.

版本说明

《需要优质托幼，我们有理由！》
德文原版由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出版，
中文版由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上海代表处出版。

© 2016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
政治与社会论坛
Hiroshimastr. 17, 10785 Berlin, Germany
www.fes.de/forumpug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德国）上海代表处
上海市静安区延安中路829号
达安广场东楼7A室
邮编：200040
www.fes-china.org

如欲订阅，请联系：
info@fes-shanghai.org

作品观点不代表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的立场。

未经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的书面允许，不得将其出版作品用于商业用途。

封面图案：
© plainpicture

Imprint

The original German version »Gute Gründe für gute Kitas!« is published by Friedrich-Ebert-Stiftung; the Chinese version is published by Friedrich-Ebert-Stiftung Shanghai.

©2016

Friedrich-Ebert-Stiftung
Forum Politics and Society
Hiroshimastr.17, 10785 Berlin, Germany
www.fes.de/forumpug

Friedrich-Ebert-Stiftung Shanghai
7A Da'an Plaza East Tower
829 Yan'an Zhong Road
Shanghai 200040, China
www.fes-china.org

To order publications:
info@fes-shanghai.org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is publication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the Friedrich-Ebert- Stiftung.

The commercial exploitation of the media published by the FES is allowedonly with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FES.

Cover photo:
© plainpicture

www.fes-2017plus.de